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2 年 7 月 30 日第 7 期

本期目录

阅史漫笔

华新民（美国） 十四军“支左”、谢富治及其他

蓦然回首

张晓良 文革开始时我刚上小学

费明 当年我们大院的儿童世界印象

书海泛舟

钟逸 徐正全和他的《雪地足迹》简介

何蜀 足迹·矛盾·忏悔——读徐正全《雪地足迹》

文摘

徐正全 最初的造反足迹

故纸堆

刘德彬 我在罗广斌死后的一些活动

编读往来

1、陈仁德来信谈杨世元口述

2、唐潇来信谈杨世元口述

【阅史漫笔】

十四军“支左”、谢富治及其他

华新民（美国）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终于被军宣队、工宣队准予毕业，分配工作，报到地点是“云南省勐旺解放军农场”，全校只有我一个人分到云南省。我庆幸军宣队、工宣队网开一面，“急急如漏网之鱼”，从北京坐了三四天火车到昆明，才知道那是昆明军区所属第十四军 42 师 124 团所办的农场，地点不在勐旺，而是在西双版纳的勐海县。

我在这支部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当了一年五个月的不穿军装的兵，是我从学校踏进社会的第一个台阶。

真想不到，这支一直驻扎在中国边陲地区的部队的名号出现在了今年五月十七日的《华尔街日报》上，报道说：薄熙来在二月初去昆明走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集团军”，军队驻地有他父亲薄一波的一尊蜡像，薄熙来前去是为了“缅怀革命前辈”，此事引起了中国高层政治领导人的警觉云云——似乎薄熙来有挟枪自重的嫌疑。

十四军与文革中的“路线斗争”

回想起四十四年前，我到达云南时，当地流传着“肃薄肃李”的口号，“薄”就是指薄一波；“李”是指李成芳，当时昆明军区的第二政委（第一政委是省委书记阎红彦，已经在文革初期自杀身亡）。这个口号的意思是要“肃清薄一波、李成芳黑线在云南的流毒”。原来，十四军的一部分起源于薄一波领导的山西决死队，李成芳抗战时曾在决死队任职，后来从十四军军长任上升到昆明军区领导。薄一波当时已经被揪出来了，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名列第一。这个口号起源于何时何地，笔者没有考证。当时只要中央揪出了什么“走资派”或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下面自然会有人“上挂下联”，利用上层领导人的政海沉浮，谋求本人或者本派的利益。

事实上，那时离薄一波在山西组织决死队已有三十多年，十四军内只有师以上的少数干部可能还跟薄一波有过上下级的关系。抗战胜利后，这支部队就归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后来的陈赓、谢富治兵团，随着陈谢进军云南后一直没有离开过。谢富治在五十年代一直是云南省的党政军第一把手，直到1959年进京接替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所以，与其说十四军有薄一波的流毒，不如说是谢富治的嫡系部队。“肃薄肃李”似乎也没有对军队的领导层有大的冲击，当然，同薄一波划清界限的表态是少不了的。李成芳似乎靠边站了一阵子，后来就离开云南到别处当官去了。

十四军当时的军长叫梁中玉，出身于山西决死队的军人，也没有受到什么牵连。相反，他领导下的十四军在云南的整个文革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这种作用，在全国来看也是相当独特的：全国的军队在1967年初开始“支左”介入文革的时候，由于军队本身的成份和常年受到的政治灌输，自然会支持群众组织中与自己“同质”的相对“保守”的派别，这些派别常常在运动初起时保卫各级党委，组成成份上也比较“纯洁”——基层干部、党团员和出身于红五类的群众占较大比例。全国各省的军队支左几乎都是这样的模式，即使在北京，卫戍区派进各中学军训的部队也有类似的倾向。但是昆明军区的部队（十三军和十四军）却与众不同，他们支持的是云南省两派中较为激进的造反派——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为核心的“八派”，反对相对保守的“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炮派”。

笔者到达云南的时候，该省的两派斗争大局已定。康生、谢富治在1968年一月接见了昆明军区和云南省两派代表。康生“凭革命四十年的经验和敏感”，在会上断言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赵健民是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

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乱边疆，并当场将赵健民拘捕。由于赵健民是受到“炮派”支持的主要干部，“炮派”成了两条路线斗争中“站错队”的组织，而反对赵健民的“八派”就成了云南省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造反派一派独大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除了上海以外，在全国也是罕见的。昆明军区以及十四军在“支左”中站对了队，自以为“路线斗争觉悟”高。部队里的各级官兵在我们这些新兵面前都表现得十分自信。那个时候的说法是“亲不亲，线上分”，说起他们那些多少跟阎红彦、赵健民有点瓜葛因而“站错队”的首长来，毫无军人常有的那种下级对上级的崇敬。

这种超强的“路线斗争觉悟”使我们从外省刚到的人印象深刻。有这么一件事，至今难忘：从昆明到勐海要乘汽车走五六天，半路上，云南农业大学的军宣队和工宣队追上我们的连队，要将我们的连队中几个该校“炮派”的学生头头带回学校接受批斗。这些学生已经毕业，带队的军人本来是可以拒绝的，但是事涉“路线斗争”，他们把那几个学生交了出去。过了几个月后，这几个学生回到我们中间，闭口不谈在学校批斗的遭遇，因为他们在连队里要继续接受“帮助”。后来有一天连队发生了一件奇事：被揪回学校批斗的学生之一将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蘸点酱油生吞了下去，说是生吃小老鼠可以治腰背伤痛。人们这才猜出一点他们回学校后所受到的待遇。

不仅这些当过头头的学生，凡是参加过“炮派”的普通学生和小头目，在我们连队的“路线斗争”学习中也要人人过关。领导我们连队的军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路线斗争”，而且是云南省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似乎那才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中心。像我这样从外地来到云南的学生，在原来地区的文革运动中表现怎样，他们并不关心。于是我们得以置身事外，除了体力劳动以外，在美丽的西双版纳雨林中过了一段时间平静的“田园生活”。

十四军的老首长谢富治

昆明军区以及十四军为什么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军队不同，在文革整个过程中始终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笔者觉得跟谢富治的长期经营有着一定关系。军区的上层领导在文革中是否得到过老首长的提示？这是一个值得文革历史的研究者考证的问题。从谢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现来看，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和布局有着比别人深刻的认识，因此在文革的前半段时期，他地位变得越来越高，成为毛泽东推动文革进程的一个关键人物，在此过程中对以前的老部下有所提醒和影响，不是没有可能的。

说到谢富治，他当时不仅是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还是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的政委，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谢富治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个文革中最新出炉的新政治局里，军人特别多，二十一个政治局委员中，除了原来就是政治局委员的朱德、刘伯承、叶剑英和林彪以外，新加入了林彪系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另外还有谢富治、许世友和陈锡联。毛泽东的原意显然是希望这些军人能够为他一手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

以他们手里的枪杆子作为他身后江青及文革派执掌政权的“坚强柱石”。然而，事后的发展显示，这些军人中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一心一意追随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似乎只有谢富治一人。林彪和他的党羽在一年后的九届二中全会（1970年庐山会议）上就开始和毛泽东、中央文革分道扬镳，突然发动对张春桥的攻击，让毛泽东看到了林彪系军人对于他的文革事业的异心，这些人都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旧部，最受毛泽东的信任，但是为了让江青接班以确保文革路线的继续，毛泽东不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铲除这个军人集团，最终导致林彪、叶群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机毁人亡以及事后对黄吴李邱的清洗。

这时政治局里，除了朱德、刘伯承和叶剑英，只剩下了三位能够在毛泽东一代人身后影响大局的军人：谢富治、许世友和陈锡联。他们都来自红四方面军，属于张国焘的旧部，但是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忠臣。其中尤其以谢富治最受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甚至超过了黄永胜等嫡系人马，可惜谢富治此时已经身患重病，在1972年3月去世，天不假年，仅63岁。余下许世友和陈锡联二人，原来在毛泽东的接班布局中只是“第二梯队”，现在被推到了第一线。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于毛泽东个人的忠诚没有问题，毛泽东也赞其“厚重少文”，但是许世友并不赞同文革的路线。毛泽东让张春桥出任南京军区政委，并一直试图撮合他和司令员许世友的关系，希望许世友扮演汉初在刘邦死后安邦定国的大将周勃的角色，以手里的枪杆子在他身后支持中央文革的路线。但是许、张二人无论在政治路线还是性格方面都格格不入，完全没有合作共事的可能，令毛泽东深为失望。毛泽东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配了一个政委——自己的侄儿毛远新，陈锡联表面上同毛远新合作愉快，使毛泽东误以为可以将辅佐毛远新的重任托付给他，在临死前不久让叶剑英退休，意在由陈锡联主持军委为毛远新和文革派撑腰。可是毛泽东死后，在华国锋抓捕“四人帮”和毛远新时，陈却无所作为，拱手把全国军队的控制权交回给叶剑英。

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一世英明，但是身后的接班安排却完全落空。我们不妨设想，假如谢富治在毛泽东辞世时仍然健在，历史将会如何展开：华国锋1972年进京出任公安部长，又在第二年进入政治局。同时，陈锡联从沈阳军区司令员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两个任命可以理解为毛泽东试图用华、陈二人来弥补谢富治离去造成的残缺的接班布局——公安部和北京军区正是谢富治控制下的关键部门。假如谢富治在世，他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兼公安部长、副总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政委，毛泽东以上这些政治安排统统可以省去。而且，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来看，谢还有华、陈二人加起来也无法比拟的优势：

其一，谢富治长期在中央工作，同中央文革的人结下“深厚战斗友谊”。在“二月逆流”中，多位副总理和老师指责中央文革时，谢富治是唯一站在中央文革一方的副总理。1967年七二〇武汉事件中，他同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一起被保守的群众组织劫持，解救出来后回到北京，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在当时人们心目中，谢富治无异于是中央文革里的一名成员。

其二，谢富治为了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不惜得罪自己的老上司陈云、邓小平、徐向前，多次在中央会议上向他们发难。谢富治还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重要成员，秉承江青的旨意不遗余力为刘少奇罗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也就是说，谢富治是交过“投名状”的人（注：《水浒传》第十一回写林冲雪夜上梁山投奔占山为王的匪首王伦，王伦要他交“投名状”来，即要他先下山杀一个人，将人头交上，以表明他坚决入伙不再回头的决心，方能接纳他），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

还有最后一条，就是谢富治虽然跟中央文革一样的极左，却没有中央文革那种张狂跋扈，在公开场合比较低调。北京的各派学生组织和个人常有炮打谢富治的举动，他从不为此打击报复。不像上海那些炮打张春桥的学生无不受到残酷的迫害。因此，谢富治在群众中并不像其他中央文革成员那样招致那么多怨恨。

假如谢富治不是在 1976 年前死去，必是毛泽东临终托付重任的第一号“顾命大臣”。他彻底得罪了以前的上司，肯定不会像华国锋那样同叶剑英、李先念等老臣私下里联合起来对付文革派。在他辅佐下的江青、毛远新和中央文革，继续坚持推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或者按现在流传的一种说法：由江青、毛远新“接班”）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那样，就不会有什么陈云、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的复出和刘少奇的平反了。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或许因为这种可能性并非完全虚妄，让后来那些复出的“走资派”每想到此就不寒而栗。以致在谢富治已经离世多年后，还要将他和康生一起钉到历史耻辱柱上。1980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当初对其一生盖棺论定的《悼词》。1981 年 1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站错队”的不同命运

谢富治遭到的“死后算账”，对于十四军显然有不小的冲击。这一次，它要做文革初期相反的事：同谢富治划清界限，同复出的薄一波恢复关系——薄一波的蜡像，大概就是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除此之外，据网上资料，1984 年，陈赓将军的公子陈知建来到十四军主力师 40 师当副参谋长兼团长，可能也是该部队冲淡同谢富治历史渊源努力的一部分。

事实上，早在 1976 年“四人帮”被捕以后，这种“转弯子”的行动就已经开始了。随着云南省阎红彦和赵健民案的平反，原来军内“站错队”的干部恢复了职位，当初“路线斗争觉悟高”的那些军队干部命运如何，外界所知不详。在地方上，云南省文革中的两派命运发生了逆转：原来的“八派”头头，全国硕果仅存的少数还在掌权的造反派，全部下了台，其中一部份被送进了监狱。上海到西双版纳插队的知识青年朱克家，因为被姚文元发现并树为全国知青的标兵，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时年仅 23 岁，会后进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仅仅因为同那些省革委会里的造反派头目有来往，也遭到隔离审查。

笔者几年前回到昆明，曾见到一位原来昆明工学院的学生，“八二三”的头

头，刚从监狱出来，沦落为社会无业人员。说起往事来，让他感到不平的是，当年他们掌权时干的坏事，大多由革委会里的军代表所决策和主导。后来他们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进了监狱，而那些军代表却悄悄回了部队，基本没有受到追究，大多已经离休、安享晚年了。

十四军与沙甸事件

说到十四军在文革中干的坏事，笔者觉得最缺德的一件，就是它作为主力部队参与了对红河自治州沙甸回民的武力镇压。据当初一位在农场带领我们的军人复员后对我们的同学说，他们原来所在的团负责攻占一个村庄，一开始就用炮火将该村庄炸平，部队进入村庄时，村内已经几乎没有活人，后来从别的回民地区迁移很多人来填补这些无人的村庄。这位军人本人也是回族，说到进村看见的惨状，不胜唏嘘。

这件事发生在 1975 年的 7、8 月份，事后还在昆明举办了展览会，展示沙甸“反革命叛乱”事件的各种证据，各政府机关和厂矿单位都要组织员工前去参观。我记得展览中的罪证有各种枪械弹药之类，还陈列了叛乱分子妄图成立“蒙自伊斯兰共和国”的传单和旗帜（沙甸公社属蒙自县）。

民间听到的传说，则是另一种故事：沙甸是有着深厚穆斯林文化的地方，《天方夜谭》的中文译者即出自这里，村里还有人在开罗的大学里教书。沙甸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沙特阿拉伯因此推迟了同中国建交。笔者不知这些传言是否正确，不过文革后中央就给沙甸回民平反，说是那些叛乱证据都属子虚乌有。平反的文件把酿成惨案的责任向上推到林彪、“四人帮”的头上，向下推到曾在云南主持工作的谭甫仁和周兴的头上。事实是，林彪集团早在 1971 年覆灭，谭甫仁也早在 1970 年被刺身亡。中央当时的真正决策人是尚未失势的邓小平，而调动部队的决定权显然是在毛泽东手上。

十四军原辖 40、41 和 42 三个师，在 1985 年的大裁军中并入了来自其他军的部队，重组为第十四集团军。而我们原来接受再教育的部队 42 师，则整个编制被裁撤掉。这也不奇怪，因为 42 师原是由地下党员廖运周在淮海战役阵前倒戈带过来的国民党部队，跟薄一波一点关系都没有，受陈赓指挥的时间也最短。缺乏光荣的历史传统，又没有老首长的关照，不裁你又裁谁呢？

2012 年 6 月 23 日

【蓦然回首】

文革开始时我刚上小学

张晓良

1、东林小学改红名

1966 年，我读小学一年级。当时依外祖母在江苏无锡居住，读的是东林小

学。这东林小学的校园便是明代东林党的东林书院，记得校园里某处墙壁上嵌着四块石刻，上书约一米见方的“东林书院”四个大字。开学不久，文革中盛行的改名之风吹来，东林小学改作红小兵小学。语文课只教了“b、p、m、f”四个拼音字母便改读毛主席语录了。

好几次早上来到校门口，把门的五年级同学说：“今天老师开批斗会，不上课啦。”我们这些一年级的同学自然就乐得转身回家玩去了。

2、反写的认罪书

全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无锡城里也挖出了许多“历史反革命”。我住在人民路福田巷19号，四户人家。其中一户男主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被勒令写认罪书。此人右手有残疾，改用左手写字，但写出来的字全是反的。他便在白纸上衬张复写纸（当时叫印蓝纸），用圆珠笔写，白纸背面的笔画被复写纸印出来蓝色字迹便是正的了。认罪书贴在门口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因为我在他家看过他如此写字，印象特深。

3、毛主席语录

外祖母有一本64开本的《毛主席语录》，红色塑胶封面，“毛主席语录”五个字是凹进去的。父母寄给我一本128开本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五个字是金色的，上面还有毛主席像。外祖母很是羡慕，几次与我商量，想借去参加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学习活动，我偏偏不答应。一次外祖母又提出要借，我说：“是爸爸给我的。”外祖母一下生气了，指着我身上穿的棉袄说：“这是我给你买的。”我便脱掉棉袄，外祖母连忙替我穿上，再不提这事了。

我曾随外祖母到居民委员会参加学习，一帮老太太唱毛主席语录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反复吟唱，“敌人”唱作“跌宁”，“拥护”唱作“拥无”，“我们”唱作“我俚”，皆无锡口音。

4、毛主席像章

我和外祖母是租住在外祖母的表姐家，我称呼外祖母的表姐为舅婆。一次舅婆带我去市场买菜，我胸前戴着一枚圆形金色毛主席像章，被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孩一把抢去。菜市场人多，我追赶了一阵没追上。气得哭了，但也无奈。当时有种说法，叫做抢毛主席像章不犯法——大约认为这种行为表现出的是对毛主席的热爱吧。

舅婆有一枚长方形像章，左边是毛主席头像，右边是本书，上写“为人民服务”，涂有红色透明漆，比我那枚被抢走的更好看，是舅婆的女儿给她的，平时舍不得戴。舅婆答应将这枚像章送给我，我才擦干眼泪跟着舅婆回家。

5、“巧克力兵团”与“豆腐花战斗队”

小学经常不上课，我就到处闲逛。一次在床垫下拿出外祖母放的两块钱，上街买了一小块巧克力，喝了一碗豆腐脑（无锡称“豆腐花”），还买了一些小零食。

剩下一块多钱回家上交，还是被外祖母打了屁股。结果被邻居取笑了一阵，说我一个人上街造反去了，还成立了“巧克力兵团”与“豆腐花战斗队”。

6、上学报名问成分

要上小学二年级了，父母怕外祖母管不住我，便把我送到江苏常州乡下，与祖父祖母一起生活。读的是武进县奔牛公社西林大队黄巷小学。

学校设在一座已经没有佛像的庙里。堂兄带我去学校报名，老师问：“什么成分？”堂兄抢着答：“贫农，贫农。”后来我才知道，祖父实际是中农。村里无地主，有一户富农，受尽歧视。

学校教唱过一首《我是贫农好后代》的歌，不管什么家庭出身的孩子都这样唱：“我是贫农的好后代，党的教导记心怀，踏着前辈的脚印走，把革命的红旗接过来……”

7、成绩汇报单

在黄巷小学读到四年级。我保留着四年级上学期的成绩汇报单：一张 32 开纸，刻钢板油印。左半部分开头是“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下面是致家长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彻底摧毁了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文化教育阵地，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在形成。我校在贫下中农管理下，无产阶级的一代新人正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

加盖着“西林大队教育革命委员会”印章，时间是 1970 年 6 月 30 日；右半部分学生姓名下是老师评语：

本学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复课闹革命，进步较快，能积极领导红小兵搞好宣传活动，学习成绩也有显著提高，能积极参加大批判……

语文：优秀。数学：良好。

假期注意事项：1、坚持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2、积极参加红小兵活动，做红色宣传员；3、努力锻炼身体，玩正当游戏。

家长意见（祖父填写）：张晓良在家不大虚心，骄、躁之性还有存在，家庭作业不大认真。

我曾与堂哥堂弟及同村小朋友一起举着语录牌去上学。祖父给叔父打草鞋，在我央求下，祖父特意给我夹了一些布条打了双“草鞋”。放学时，各村的同学各站一纵队，喊了口号才回家。老师见我穿着“草鞋”，还提到艰苦朴素的高度给予了表扬。这大概就是评语中“能积极领导红小兵搞好宣传活动”的由来；关于“能积极参加大批判”的评语，记得我写过两篇小评论，分别批判据说是刘少

奇散布的“读书做官论”和“读书无用论”。既然读书可以做官，怎么又说读书无用？我那时根本就没去多想。反正都是按照老师讲的和大人们宣传的去写就是了。

8、学唱样板戏

乡村里每家都安装了有线广播，早中晚定时播出三次，样板戏的经典唱段是保留节目。记得一次中午还播出了教唱样板戏《沙家浜》，沙奶奶唱一句，接着一群人的声音学唱一句。我觉得很新奇，等播出停止后，便搭了凳子站上去，对着有线广播的木盒子也学唱了几句。事后一段时间老想着，有线广播的另一头听见我学唱了吗？

某年过春节，祖父给了我五角钱压岁钱。我到奔牛镇上的新华书店买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两本连环画，看完后再借给堂兄弟看，再借给同村其他小伙伴看。我在打猪草等农活方面不如小伙伴，这两本连环画维持了我一段时期在同伴中的好感。

9、父亲参加“造反”受挫

父亲是1948年的高中毕业生，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武汉军区司令部作战部任参谋。文革中，父亲跟随武汉军区某二级部的首长参加了“造反”活动，结果被陈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关了半个月，以后，又被送到军区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父亲给祖父来信说到被关，也寄来了他在干校的劳动果实——一包花生米，时在1969-1970年。

父亲在1961、1962、1963年三次荣立三等功，和平年代，不易。但自从文革中参加“造反”受挫后，父亲即辗转于干校、工程团、军分区、武装部，不断走下坡路，郁郁不得志，五十二岁就去世了。

10、自我总结8条缺点6条优点

小学五年级我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附小就读。我保留着五年级上学期的成绩通知书。通知书上的“最高指示”依然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成绩——政治：（见鉴定），**语文：**优，**数学：**良，**常识：**优，**劳动：**（见鉴定），**军体：**良，**革命文艺**分为**音乐：**良，**图画：**优。

班委及老师鉴定：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讲用”，有时能向坏人坏事作斗争，劳动比较好，能积极参加锻炼身体，能遵守课堂纪律，能认真完成各科作业，本学期初评时受到连里表扬（注：当时学校实行军事化，年级为连，班级为排，小组为班）。希望继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好人好事，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加强革命团结，进一步提高执行革命纪律性的自觉性，做毛主

席的好学生。

个人小结部分，我引用了三条“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认真总结经验。”先列缺点8条：同学打我我也打同学，说话不和气，有时迟到，不按时交作业……再列优点6条：每天坚持三带（即带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长方形红小兵胸章），好事做得多，对坏人坏事敢于揭发，讲用积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

11、排演《白毛女》选段

五年级课本里有歌剧《白毛女》选段，老师便组织同学排演，以增强教学效果。大春等主要角色轮不到我这个才从乡下来的孩子，黄世仁、穆仁智也被两个调皮且有表现欲的同学主动承担，我分到一个民兵的小龙套。因为饰演黄世仁的同学把他父亲的一件呢子上衣穿来显示地主的富有，我便从母亲的缝纫机抽屉里找了块黑布缝在白衬衣上代表翻身农民的穷苦，这些没有老师的指导，全凭同学的演出热情。因为我们演出的是选段，没有杨白劳给喜儿扎红头绳的情节，所以被老师分配饰演杨白劳的某同学没有一句台词，而且上场就死了。

“多少长工被奴役，多少喜儿受苦难。穷苦的人儿，地作床来天当被盖。诉不尽的仇恨啊！汇成波浪滔天的江和海。压不住的怒火啊，定要烧毁黑暗的旧世界！”一排同学边唱边向舞台两侧走开，便露出了躺在地上已死的杨白劳，这时喜儿哭着上场：“爹爹！爹爹！你死得惨……”八路军来了，斗地主，我和另一同学饰演的民兵上场，押着黄世仁和穆仁智。毕竟还是小学生，两个反派跪在地下一边装着害怕而发抖，一边还在偷偷笑，我却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威风凛凛地拿着红缨枪站在他俩身后……

12、“讲用”怎么出新

小学五年级，经常开讲用会，全称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汇报会。一些同学讲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放学路上帮人推车，扶老大爷过马路……大家都这样编来讲。讲来讲去都成了老生常谈，毫无新意。

怎么办？请教邻居一位大我三岁的姐姐，茅塞顿开：引入思想斗争。看见一人拉车上坡，好像有两个小人在头脑里打架，一个说“快去帮助推一下”，一个说“还是回家做功课吧”。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于是忙赶上去帮助推车。

13、翡翠、大粪、草绳

水利电力学院附小有块水稻田，我们五年级三个班都轮流去参加劳动。我还写过作文，形容这块绿油油的稻田“像翡翠镶嵌在祖国大地上”。

一次我与一名同学被分派去为稻田积肥，两人抬着粪桶粪瓢四处寻觅，在学院一教学楼后，我俩掀开了联通厕所的下水道井盖，没淘到什么。正欲离开，听见楼内厕所有冲水的声音，同学连忙用粪瓢接着出水口，果然有“干货”。回来

路上，我们用“没有大粪臭，哪来稻谷香”来鼓励自己。

秋天，稻谷成熟了，收割后发现搬运成问题。我在乡村读书时学会了搓草绳，便自告奋勇搓草绳用来捆扎。老师发现我这个“技术人才”，还临时安排两名同学跟我学徒，他们学着我，往左右手心吐口唾沫，开始搓草绳。每根近一米长，搓好一根立即被拿去捆扎。我搓的质量明显高于学徒的，同学们都等着我的草绳。

14、看电影印象

在乡村三年里只看过两次电影，实际是一部 1969 年国庆活动的记录片，只记得天安门城楼上有位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的武官不停地挥动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小伙伴们对他的大檐帽和高鼻梁很感兴趣。第二天听说隔壁大队也要放电影，大家又赶去，结果还是这部纪录片。

来到城市后，倒是每周看一场电影。水利电力学院有个露天电影场，每场五分钱，自带小凳子。为了容纳更多观众，银幕设在电影场中央，正反两面都可以坐人观看。放映故事片前必加映《新闻简报》，其中多有毛主席形象，主要是接见外宾。只要毛主席一出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鼓掌。动画片《半夜鸡叫》表现地主周扒皮为催长工早点上工，半夜学鸡叫，后遭高玉宝设计痛打的故事。某次加映了英语版的《半夜鸡叫》，大概是帮助大学生学英语的教学片。至今记得周扒皮装鸡叫后手持棍子到长工屋里边敲打长工的被子边骂“lazy bones, lazy bones”（懒鬼、懒骨头）。

15、贫下中农开灯

初中一、二年级我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附中就读。初一时，学校组织学生到郊区农村参加劳动，自带铺盖，五六个同学一组睡在农民家的堂屋里。那时已经不时兴笼统称农民了，而是按“阶级观念”称“贫下中农”。

某男生半夜尿急，摸不着尿桶，也不知电灯开关在哪里，急得他大叫：“贫下中农开灯，贫下中农开灯！”

16、舞蹈《车水忙》

读初一时，老师从各班抽了男女生各 4 名，排演舞蹈《车水忙》，我不知为何被抽中。说是舞蹈，其实是 4 名男解放军战士与 4 名公社女社员边便跳边唱：“车水忙哟喂，车水忙哟喂，脚踏水车，脚踏水车，喜呀喜洋洋啊喜洋洋……”我们的打扮都是裤腿卷至膝盖，脖子挂着白毛巾，打着赤脚，模仿着脚踏水车的动作。

汇报演出时，家长都来看，母亲说我跳得像个木偶。当时男女同学之间很少讲话，称之为“划清男女界限”，表演中有个体现军民友谊的握手动作，我们都似有似无地一掠而过。当时水利电力学院有军宣队，有驻军，我们这个节目还去给驻军慰问演出。演出前临时向解放军借了 4 顶真正的军帽带上，一位男生叮嘱大家，今天是给解放军演出，握手的动作要做好，真正地握手。

17、大队书记的“阶级教育”

初二时，学校从每个班抽调几名同学到郊区农村做社会调查，帮助写村史。我被班主任以“能写会画”而推荐参加。

磨山大队党支部的蔡书记给我们讲，解放前，某贫农牵着一头牛走过地主门前，牛拉了一坨屎。蔡书记说这表现了农民的反抗精神。为此我画了一幅《牵牛拉屎于地主门前》，且将地主家的大门涂成红色，以对应“朱门酒肉臭”。

蔡书记又讲，解放后，某地主因瓦房被分给了贫下中农而改住草房，过年时地主贴出对联：“大雨陡下瓶子罐子坛子；太阳一出鸡蛋鸭蛋鹅蛋。”上联谓草房破旧漏雨，下联指阳光从漏洞照进来形成大小不等的光影。蔡书记指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老地主借机诬蔑社会主义农村大好形势。

18、学工学农学军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称作《五七指示》，其中有一段：“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在读小学、中学期间，多次学工学农学军。

学军，参加实弹射击，打了一发子弹。

学工，在武汉锅炉厂401车间技术革新组三个月。

学农，最长的是高一时整整一个学期，语文课是访贫问苦写作文，数学课是小平板测量，没有物理、化学而代之以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前者学会开手扶拖拉机，后者在稻田里捉得二化螟、稻纵卷叶螟、黑尾叶蝉若干计成绩。

学期结束时，全班同学齐声高唱电影《决裂》主题歌《共大赞歌》：“共大花开分外红，教育革命起东风，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嘞，三大革命打先锋嘞……”

19、上课考试扎银针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万年的枯藤发了芽，开天辟地头一回，聋哑孩子说了话……”这首《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的歌，赞扬文革中解放军白衣战士用中医针灸使聋哑人开口说话的动人事迹，当时广播里经常演唱。还有针刺麻醉等等宣传，一时针灸似乎能治百病。中学开了生理卫生课，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粗粗带过，生殖系统自学。老师单把针灸好好地讲了一番，还实际操作。有针无灸，考试时扎10个穴位满分。我是学习委员，带头，自扎人中、合谷、足三里等9个穴位，与另一同学互扎头顶某穴位。每扎一穴位，便举手报告，待老师前来验看时，忙说：“涨！麻！”以示扎对了穴位。实际有的穴位估计没扎准，并无“涨麻”之感。

20、批斗模拟“四人帮”

1976年打倒“四人帮”，学校在操场上组织了游行活动。各班都是排着队，举着标语，呼喊口号。我们这一年级的一个班别出心裁，找了四个同学化装成“四

人帮”，另有两名同学化装成解放军押着他们走在全班的前面。张春桥好办，穿件中山装，戴副眼镜；王洪文、姚文元分别由瘦高、矮胖两位同学扮演；没女同学愿饰演江青。于是一位男同学自告奋勇，借了件黑色裙子，用块黑纱蒙住头，戴副眼镜，穿双半高筒雨鞋权作皮靴。哪知小腿没遮严，露出许多汗毛，一时引得大家发笑。

21、工农兵学员不识“杨贵妃”

1977年，我在武汉市洪山中学读高二，有华中师范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来我们学校开展教学实习。其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刚出版，人手一册，学校要求通读全本，精读若干篇。一工农兵学员领读《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可他却把“杨贵妃”误读为“杨贵己”。

22、学习吴洪广

小学、中学期间，除了常年学习雷锋外，还经常涌现出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各类英雄模范人物需要学习，学了就要写心得体会。一次学校组织学习武汉市郊区一个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吴洪广，写心得体会时我写了诗歌体，记得开头四句是：“阳光雨露育新苗，毛泽东思想育新人，一代新人在成长，出了一个吴洪广”。

今天谁还知道吴洪广？

23、奖状、喜报中的时代印记

1976年7月，高一下学期，我被评为三好学生，奖状写着：“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坚持教育革命，表现突出……”

1977年2月，高二上学期，三好学生奖状写着：“遵照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化课，积极锻炼身体……”

1977年7月，高二下学期，三好学生奖状写着：“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化课，积极锻炼身体……”

1977年7月20日收到喜报：“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你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积极报名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贡献。特此报喜。”（我初中读了3年半，高中读了2年就毕业了。当时武汉市高中都是2年毕业，不像现在高中要读3年。）

1977年12月获得湖北省荆门县十里人民公社革委会黄金港综合场党支部颁发的奖状：“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在揭批‘四人帮’的

伟大斗争中，做出了显著成绩……”

所谓“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大概是因为我参加了综合场的文艺表演，演的是湖北渔鼓（一种地方曲艺）：“粉碎那‘四人帮’啊，全国人民心欢畅，揪出‘四害’挖祸根，党中央真英明哪……”

24、“做革命的看家狗”

1978年底，我穿上军装，坐上“闷罐子”火车来到西北，在戈壁滩上度过了三年军旅生涯。其间曾听说一件与文革有关的轶事。

牛与狗，在文革中似乎被涂上了政治色彩，牛是正面形象：俯首甘为孺子牛，勤勤恳恳的老黄牛；狗是反面形象：帝国主义的走狗，资本家的乏走狗，地主的狗腿子，痛打落水狗……

部队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讲用者结尾多表态：“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做革命的老黄牛！”某人欲出新意，说出：“做革命的看家狗！”台下听众一愣，因有“革命的”定语，大家遂热烈鼓掌。

【蓦然回首】

当年我们大院的儿童世界印象

费 明

我是在沈阳市，南塔下，文化路上的一个科研大院出生的。我们这个科研大院从1953年建所开始，某种意义上说，一直是处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说封闭，是因为整个大院都是用一人多高的砖墙与外部世界隔绝起来的，里面一半的面积为工作区，另一半是家属住宅区。职工们每日在所内上班，家属们的活动范围也基本是在大院中。院外东、西两边，有两个不算小的商店，供应院里三千多职工和家属的日常生活所需。院内还有个医务室，小病不用出院门就能得到治疗。我们这个科研所的“周围邻居”，也都是自成系统的单位：有几所大专院校，还有陆军总医院和空军司令部，这些单位也都是用高墙和外部世界分割，相互间没有多少来往。

我们这些科研所出生的孩子们，从小到大就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与成人世界相对应的孩子世界。职工们的工作是以研究室为单位来进行的，遇到需要自报家门的情况，都会说：我是一室的，三室的，八室的，等等。而我们孩子们的活动则是以住宅楼为单位来划分的，每一栋都是一个“堡垒”，由于这些住宅楼的侧面都有清晰的楼号标示，不同住宅楼的孩子便把自己所住的楼号当作自己的“单位”名称。初次相识，相互间都会问：你是几栋的？回答则是：1栋的，3栋的，12栋的，等等。

文革初期，我们大院一共有20栋职工宿舍楼，大部分是3层2门12单元的红砖楼。据说当时是按苏联式样来设计的。除了12栋、13栋是一单元3居室的高研楼——高级研究员的宿舍外，其余的楼都是2室或1室的单元。我们这个大

院，是两家研究所合用的，20 栋宿舍楼也分别属于两家研究所。这样一来，孩子们互相的认识除了有“栋”的分别外，还加上了“所”的分别。

我所居住的 12 栋是高研楼，这个 12 栋的名号，对其他孩子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只要一报栋号，对方就会对你的家庭状态乃至社会地位有个初步的印象。12 栋在文革前孩子不多，文革后，先后住进了好几户“出身好”的普通职工，他们都是些 30 多岁的人，每家都有几个孩子。这些孩子们的加入，壮大了 12 栋孩子团体的队伍，让我们在其他“栋”面前，也显得多了几分“力量”。

我对这个孩子世界的清晰记忆，是从 6 岁开始的，那一年九大召开，所内因文革带来的混乱开始平定，我也能比较自由地在楼外玩了。那时各个栋内部，“出身好”的孩子和“出身不好”的孩子也能玩在一起了。

文革初期那些年，除了和外公、外婆出门买菜外，我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呆着。外面的世界很乱，我们的出身又不好，属牛鬼蛇神一类，大人们根本不敢让我到外面去玩。其他楼那些“出身好”的半大小子，经常欺负“弱势群体”。1 栋有个老太太，做过大户人家的小老婆，无儿无女，晚年和侄儿一家住在一起。这个侄儿，由于“历史问题”，也在被专政之列。这样一来，这个老婆婆就成了那些“红后代”欺负的对象，只要她一出家门，就会有一群孩子围着她叫：地主婆，小老婆……

文革最混乱的时候，我和外婆出去买菜，也曾被这些半大小子追着扔过石头。1969 年之后，所里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我还是只能在家门口玩，不敢到 12 栋之外其他楼的地盘上去。

我们这 20 栋家属宿舍，每栋都有自己的特色。除了楼的设计有分别外，居住成员的“名气”让每栋楼有了独特的“色彩”。到访的外人也许看不出来，但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眼中，每栋都自成体系，各有各的风格。离我们 12 栋最近的是 1 栋和 13 栋。1 栋是一幢 18 户 2 门洞 2 居室的三层楼房，背对研究所正门的主道。文革时期所内唯一一座伟大领袖的画像，就在这栋楼的前面。我们大院所有的住宅楼都是南北向的，有的是坐北朝南，例如 8，9，12，13 栋；有的则是坐南朝北，例如 1，2，3，4 栋。从我对 1 栋有记忆开始，它的名字就是和“流氓家庭”连在一起的。

1 栋住有一特别的家庭，这家的父母我从来都没见过，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大院的工作人员。这家人出名，不是因为父母，而是因为他们有几个“不得了”的孩子。他们家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儿。大男孩儿叫“老眼（音）子”，中间的那个叫“老三子”，小的男孩儿叫“老甚（音）子”，那个女孩儿最小，比我还小几岁，顺理成章地被叫做“老丫头”。据说“老眼（音）子”还有个哥，但似乎不在这儿住，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庐山真面目。我们院里的孩子们，没人不知道这哥四个的，尽管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们真实的名字，甚至连姓什么也不知道，但一提起他们的外号，绝对是尽人皆知。

这个家庭是 1 栋的一霸，也是大院里数得着的“麻烦”。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干过什么，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惧怕他们，不敢到 1 栋的周围玩。在我还是个小

丫头的时候，这家的老大大概十六、七岁左右，中间的那个男孩儿十三、四岁，小的那个十一、二岁。我曾亲眼目睹过这小的哥俩欺负人的过程，很凶恶的样子，嘴上粗言秽语，手足并用地教训其他孩子。大院孩子们的世界里，关于他们的传闻很凶，有很多年，我都不敢靠近一栋，连经过他们那栋门口，都要看看是否没人。因为他家门口总是聚集着一堆堆的小流氓样子的半大小子，很恐怖。如果他们在，我宁肯绕远点，也绝不从他们的前面走过。

后来，我长到十二、三岁时，出于对这哥几个的好奇，我成了那个“老丫头”的玩伴。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放学后，都去找她玩。还从小哥“老甚子”那里借过一本禁书（书名忘了）。近距离的相处，令我消除了对他们的恐惧，神秘感自然也没了。其实他们也不是坏到哪里去，大概就像电视剧《血色浪漫》里的那些大院少年，把青春和精力都浪费在楼门口晃悠和打架斗殴上罢了。多年之后，和一位好友的兄长（也是我们大院的子弟，比我大3岁）说起借书之事，他居然把眼睛瞪得牛大，说：你还敢从他那儿借书？可见这几位少年在我们大院的孩子中间，真是“威”名远扬。

像1栋哥几个这样的“小霸王”，其他住宅楼也有，特别是在那些供所内低层职工居住的楼内。尽管他们的“名气”没有1栋这哥几个的响亮，但也足以让其他楼的孩子敬而远之。在我读小学之后，每天上下学的路上经常会遇上这类坏小子。由于我们的学校在研究所外，和研究所隔着一条小河，我们所里的孩子，每天上下学都要在研究所的西门，以班级为单位集合，然后一起步行10分钟过桥去学校。放学也是如此，全班回到西门后解散，各回各家。从我们家到西门这段路，便是我经常被“骚扰”的地方。上下学的路上，经常不走运遇上那些坏家伙们，不是被恶言恶语咒骂，就是被扔石头追打。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好些年，搞得我成天紧张兮兮。那个时候，我的父母都是被“专政”的对象，而这些坏家伙们的家长，则都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所以，我根本不敢把这些事儿告诉我的父母，因为知道告了也是白搭，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不说，还很可能令问题扩大化，严重化，变成我们这个家的“危机”。整个少儿时期，我所生存的环境一直都是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所里的那片天被重新翻过来，我才算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我从童年步入少年的日子里，整个社会极度动荡，物质极为匮乏。那个年代的孩子们，家里没有玩具，放学后也没有太多的作业（即便有，很多人也不写），课余时间能干的事，就是在外边晃荡。所以，到户外玩耍是我们童年的基本游戏方式。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游戏种类，都是集体参与形式的，要几个人才能完成。女孩子跳橡皮筋，跳房子（在地下画上格子，用碎砖头小瓦片扔进格子，然后单腿在格子里边跳边将小瓦片踢到下一格）。母亲曾说过，民国的时候，女孩子们也玩这个，跳的方式几乎和我们的相同。跳橡皮筋虽然三人以上就能玩，但大多数时间都是五六个人，甚至七八个人一起玩。跳的时候，还要唱歌谣，要随着歌谣的节奏来跳。我现在还能记得其中一首：

江姐江姐好江姐，你为人民洒鲜血，

甫志高甫志高甫志高，你是人民的狗强盗、狗强盗……

这都是什么破词，也不知道谁编的，但当时我们都唱得津津有味儿，没有哪个孩子有异议。

女孩子跳皮筋，跳房子，男孩子们弹玻璃球，扇烟纸，打“片奇”，也是几个孩子凑在一起玩。小时候，我是个假小子性格，加上12栋年纪相仿的孩子中，本就是男性多过女性，所以，我没少掺和这些小男孩子们的游戏。

弹玻璃球，就是在土地上挖上四五个小坑，然后把小玻璃球从一米外往一个个小坑里弹，出手准确，失误少的那个就是胜利者。东北的冬天很冷，弹球时把手从棉手套里拿出来后，不到一分钟就冻得僵硬。为了减少失误，弹之前，每个人都把夹住小球的拇指和食指放到嘴边，拼命哈气。一只只小黑手，一律的标准哈气动作，作为童年游戏记忆的一部分，这一切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扇烟纸的游戏没有场地限制，玩起来很方便。就是用大人们抽剩的烟盒纸，叠成三角形模样，放在地上用手扇。能够把烟纸从这一面扇翻到另一面则为赢。不是一个个扇，是几张一起扇，并不容易哟。能扇过来，有多少都归你。这样的游戏，赢者很有胜利感。

打“片奇”也是大同小异，只不过是用硬纸片代替烟纸，方圆不整的各种纸片上，还要盖上红，蓝，黑三色的，张飞，赵云等一些历史名人的头像印。玩的时候，用一张圆纸片往另一张纸片上打，把它打翻身就算赢，这一张被翻过来的就归赢家。

除了上面说的这几种，还有一些跑着玩的团体游戏，抢军旗，藏猫猫，打仗，等等。这些游戏都要求参与者绕着住宅楼四周围乱跑。那年头，楼的前后宽敞开阔，不是养鸡棚就是玉米地，为这样的群体游戏保留了足够的活动空间，只要凑够人数，随时都能玩。

文革后期，我们大院开展了一项“向阳大院”活动。这是全国性的“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的重要工作，要让每个居民大院都突出阶级斗争这个纲（当时还拍了一部电影叫《向阳院的故事》）。但在我们这儿，这项活动的目的在我们孩子眼里就变成了是要每栋宿舍楼都管好自己的那片环境，增加一些业余体育设置。活动开始后，别的改变我没看到，就是我们12栋宿舍楼旁边，多了个用烂砖头砌成的乒乓球台，我们这些孩子有了一项新的体育游戏。记得向阳大院成立的那个大会上，主持人还写了一幅对联：

向阳大院锦绣前程无限好
社会主义光芒万丈照全球

会场就是大院毛泽东塑像的前面，各栋都要派人参加，我跟在大人们的后面，也列席了会议。

不是每栋楼都有这样的乒乓球台，这个设施吸引了不少其他楼的孩子来玩。时至今日，我还是喜欢打乒乓球，家里就有一张正规的乒乓球案，夏天天气

好，就摆在后院，全家人一起玩。这一切都和少年时的经历有关。这个以“狠抓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向阳大院却培养了我一项体育爱好。

我们大院的两个研究所，每个都有自己的礼堂。那年头，礼堂既是职工们开大会的地方，也是放映电影、表演节目的地方。尽管那年头只有八个样板戏，《地雷战》、《地道战》这样的几部电影能够放映，但对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这个礼堂也称得上是生活中的梦幻所在。

我们这个研究所的礼堂，位于工作区外，宿舍区的前面，是一个有40排座椅，每排30个位子的大礼堂。天花板距离地面有3层楼高，左右两边各一排大窗户安在离天花板很近的地方，人坐在里面，感觉很宽敞，空气流通得很好。每次放映前，管理人员会把玻璃窗外面一层木窗关上，以保证礼堂内的黑暗度。礼堂前九排中间10个座位是皮椅子，其他的椅子则全是木头的。我们家住在三楼，从卧室的窗子望出去，能看见礼堂围墙最上面的部分，下面的那部分，被研究所的食堂挡住了。

那个年代，所内建筑物的墙上不刷上标语口号的几乎没有，礼堂这样的规模，更不会例外。文革初期，我看到的礼堂高墙的口号是“打倒李×”（我们的所长），后来又变成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四人帮”倒了以后，上面有新精神，建筑物上所有的标语口号都要去掉，结果，我眼前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被刷上了一层白灰，可惜，白灰不够浓，下面的字还是看得很清楚。直到1981年春节我们搬家，那“解放台湾”几个字还是若隐若现地摆在那儿。

我们的礼堂文革前就是个小电影院，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家人抱着在里面看电影。王心刚主演的《海鹰》为我留下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印象，文革后这些旧片重放，许多情节我都能回忆得起来。文革初期，礼堂里不再放电影，取而代之的都是些斗人的场面，记忆中有一次全所的揭发批判会，我们这些孩子们还列席了会议。过程内容完全不记得了，脑海里只剩下那些站在台上挂着牌子的人。八个样板戏拍成电影后，我们的礼堂又开始放映电影。《智取威虎山》是我看的第一部样板戏电影。这大概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事情。我很不喜欢看样板戏，京剧听不懂，舞剧又是哑巴不说话，没意思。当然总比没有好，至少还有画面。从那时开始，电影走进了我的生活，大礼堂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70年代中期，大院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开展了学习小靳庄的活动。这个小村庄因唱样板戏，批林批孔搞赛诗会而闻名。它是江青树起的一个在农村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所谓典型，在全国广为宣传。我们这个科研大院，每个研究室都要“载歌载舞”地开展运动。各研究室的职工们轮流在礼堂排演节目，人人都要参与。这样的运动形式，和今天的“唱红”是一个路子，都是以意识形态为目的运动群众。当时，我们这些小学生们，放学后都会结伴去礼堂观看“表演”。大人们那些完全谈不上专业的舞姿，很难看，很可笑。如果我们发现某个同学的父母也在台上“献丑”，更会笑得前仰后合。记得那时的合唱曲目有“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还有什么“红太阳，照心头，团结一致去战斗……”。当时在台下听，最反感的就是听到“无

产阶级文化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时。歌中那三句“就是好”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蛮横，很暴力，很遭人烦，让人打心眼儿里厌恶。那时的我已经十几岁，有了思考一些简单问题的能力。对文革中我家的遭遇，他们对我父亲的迫害，心中最朴素的情感就是恨。说文革好，我是绝不同意的。这种不抓生产，不搞专业研究，人人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无厘头”表演上的运动，是对社会资源多大的浪费！

邻所的礼堂和我们的礼堂距离很近，200米左右。整个文革时期，只有我们的礼堂能够放映电影。“四人帮”倒了以后，邻所才把自己的礼堂改建成一个合格的电影院。我对邻所礼堂的第一次相关记忆，是来自一位闺蜜的兄长的讲述：文革初期，邻所一位老地下工作者在被隔离审查期间跳楼自杀，地点就在礼堂边上，这位兄长亲眼目睹了死者脑浆迸流的惨状。多年之后说起来，这位兄长还是记忆犹新，还是觉得很“恶心”。受他叙述的影响，我也很少去邻所礼堂附近玩，每当走到边上，就会想起死人的事儿。尽管不是亲眼所见，那绘声绘色的描述，也让我铭记在心，足足记了半辈子。

那个时代，大院职工们的生活并不轻松，“牛鬼蛇神”们甚至很痛苦。大院孩子们的世界，虽不像大人们的那般灰暗，却也不可避免地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有委屈，有悲伤，也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游戏快乐。40年后回眸一望，别有一番滋味儿在心头。和21世纪的孩子们相比，我们的成长经历不在客厅里，也没有长辈们的溺爱。政治高压下残存的天真和童趣，伴随着那挥之不去的苦涩阴霾。我们这一代文革儿童，特别是“牛鬼蛇神”类“贱民”的子弟，成人之后，心里或多或少都埋着一种难以言说的仇恨。带着这样的心理伤痕，面对现实生活，我们付出的努力，远比正常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要多得多。这是经历文革后，不得不付的代价。

【书海泛舟】

徐正全和他的《雪地足迹》简介

钟 逸

（右图：徐正全服刑期间于1985年留影。）

徐正全，1946年3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遂宁县。12岁随母亲来到重庆。1961年下半年技校毕业，分配到重庆化龙桥街道办事处参加工作。1964年9月到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工作，1965年底不满20岁随工作单位到武汉。文革中任新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造反派一号头头、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革委会主任。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收审，1970年2月“一打三反”运动中以“打人致死首犯”罪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89年10月底出狱。自谋职业直到今天。《雪地足迹》一书着重写了



作者在文革中的经历、21年的狱中生活和出狱后的个人遭遇。

《雪地足迹》写了文化大革命在一冶工安公司的兴起和衰亡的过程，写出了文革中造反派工人的诉求和他们的命运。作者文化水平不高，但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他勤于思考，善于记事，使用四川、湖北的方言俚语和白描的手法，对社会底层的各类人物多有详尽的记述。对文革前十七年的社会弊端、文革中造反派群众对保守派群众的报复、官方对造反派群众的残酷镇压、不同时期的公检法人员的思想人品、监狱中各种犯人的心灵轨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均有详细的描述和独到的认识与反思。在那个致使他被判死刑的造反派打人致死案件中，他并不是打人凶手，他的责任至多是制止不力，但他并不以个人遭遇的巨大不幸来回避自己的责任，而是主动反思自己的行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的回忆，无疑对今天的读者真实地认识那个特殊的年代，有着极大的帮助。

《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徐正全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

【书海泛舟】

足迹·矛盾·忏悔

——读徐正全《雪地足迹》

何 蜀

“雪地足迹”这个书名很有意味。人们都知道，雪地里的足迹是无法长久保存的，不是被新落下的雪花掩盖，就是因地面的积雪融化而模糊、消失。人生的足迹都是如此，要想回头去寻找，极不容易。本书作者努力这样做了，尽量恢复了那些早已模糊或消失的足迹，为读者拼凑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人的的人生足迹链，令人鼓舞，也令人感动。

一个普通的青年工人，投身文化大革命，被时代大潮推上前台，成了一个普通的基层造反派头头……这样的人物，在全中国可以说是成千上万数不胜数。然而，《雪地足迹》的作者徐正全，不同于一般人的是，他在二十二岁时因其造反派下属成员的一桩打人致死案而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后虽然免死，仍在牢狱中度过了二十一年。更不同的是，他没有像许多有着类似命运的人那样对往事采取“不堪回首”、“休提起”的回避态度，而是一直在进行回顾与思考，并努力将这些回顾与思考以坦率直白、毫无矫饰的文字如实记录下来。

徐正全的“足迹”，虽然不涉及文革高层的斗争内幕，也很少涉及地方上文革重大事件的上层背景和来龙去脉（作为武汉的造反派，对武汉文革中最重大的“七二〇”事件，书中就基本上没有记叙，因他事前被“百万雄师”打伤后已经回到重庆老家养伤），但它对研究文革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因为它从一个平民

青年的视角，生动记叙了“毛泽东时代”的底层民众如何“在风雪漫天的艰难中跋涉”（因此他将书名定为“雪地足迹”），记叙了普通工人、底层民众在造反大潮中的活动与生存状态，以及文革政治犯（他虽然以“杀人”的刑事罪获刑，实际上是犯了“造反罪”的政治犯）在无产阶级专政牢狱中的境况，还有出狱后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奋斗与顿挫……从亲历者的角度娓娓道来，十分可读。

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虽然文化程度只有初中（技校没有毕业），但却是个喜欢思考的人。正因为喜欢思考而又坦诚不作矫饰，所以书中充分表现出了其内心的困惑、纠结。与许多原造反派人士（特别是其中“家庭出身好”的人士）一样，徐正全也有一个仍然信仰、崇拜毛泽东的心结。不过，因他对自己亲历的底层社会生活体会较深，在如实写出的历史记忆中，又自然地流露出了思想上深深的矛盾。一方面，他“本能地体会到共产党的大小官僚确实往往把人不当人”（32—33页），另一方面，他又并未（或是不愿）想到毛泽东正是最“把人不当人”的一个，而毛氏阶级斗争学说正是这种“把人不当人”的理论根源（按照这一学说，徐正全把“毛泽东时代”底层民众的生活比作“在漫天风雪中跋涉”，仅此一点就足以被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一方面，他细致生动地写出了底层民众（包括他自己）在文革中所遭遇的灾难，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文革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见该书“自序”）——这也是不少原造反派人士的通病：只承认自己在“无法无天”状态下造反、整人（不管是整“走资派”还是整对立派）是文革，不承认别人在同样的“无法无天”状态下整自己也是文革；一方面，他肯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实践”，另一方面，又为“在阶级斗争旗号下开展的所有运动，几乎都会被当权派变着法地把矛头指向群众，伤及一批又一批的人”（“自序”）而深感愤懑；一方面，他认识到文革的发生是因为十七年来“制度设计的弊端”所致，并认为“文革的努力分毫没有触动这个制度的弊端”（“自序”），另一方面，却又看不到这个有问题的制度正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亲自主持设计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毛泽东还要通过文革将其更加强化和推向极致；同时，作者还与许多从造反运动被毛泽东结束之后即开始受到排斥、打击、清算的造反派人士一样，并不认为结束造反运动，对造反派“卸磨杀驴”也是毛泽东“战略部署”中的必然一步，仍然认为那只是“走资派”的打击报复。

至于“走资派”这个由毛泽东炮制出来的含糊其辞似是而非的概念，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对其作过明确的解释和界定，从未提出过划分“走资派”的标准，他自己对“走资派”的态度也是不断在变，先提出要“斗垮”（“十六条”），并把这作为文革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主要任务之一，后来却又说“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最后又斥责“走资派还在走”……而在文革中被蛊惑被忽悠的许多造反派人士（包括本书作者）却对其深信不疑，如今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甚至把今天的腐败官员也视之为“走资派”。他们不想一想，如果腐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古代的那些腐败帝王和贪官岂不是早已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的要旨是什么？实际上，某些人近年来鼓吹的“不搞西方那一套”，说的就只是“不搞资本主义道路那一套”（因为同属“西方那一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决不会包括在“不搞”之列，而是毛泽东所尊奉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从某些人宣称的“几个不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的本质和核心内容——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应该是法大于权，三权分离，司法独立，民选政府，两党或多党竞争上岗执政，军队国家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等等。中国的哪个“走资派”是这样做或这样说的？文革中被狠打痛批的刘、邓等领导人，不过是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前提下想作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微调”而已。而被造反派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些现象，如干部与群众生活待遇上的等级差别贫富悬殊（作者在书中有关“到中南局告状”一节里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其实并不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而是皇权专制时代的遗毒，并且正是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确立下来不容挑战的“制度”（王实味因批评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惨遭杀身之祸）。

尽管本书中涉及文革历史的某些认识、评价会有争议，但因作者表达的思想情感是坦诚的，所记叙的人生足迹是朴实而无虚饰的，所以，无论是作为文革及文革前后底层民众的生活实录还是思想情感记录，本书都可以作为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作者自认为其人生中有一个关键点，我认为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即对文革中导致作者被判死刑的打人致死案件的反思、忏悔。

在文革中因打人或杀人、伤人致死而被判刑入狱的人，全国各地都有而且不在少数（这不知是否应算作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一？）。但是，这些人在出狱后，在自己尚未得到公正对待的时候，能够自愿为那一致死人的历史事件而从内心里表示忏悔的，却极少极少，能够公开把自己的忏悔写出来公之于众的则更是凤毛麟角。武汉曾经有一个当年的中学生李乾，在他的回忆录《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美国·柯捷出版社，2010年）中对自己在文革中出于“打击流氓”、“维护革命新秩序”的“正义冲动”而杀人的罪过，作出了沉痛、真诚的忏悔，当年重庆大学的学生郑志胜，因在处理武斗尸体中激发起来的派性仇恨而参与了虐杀对立派俘虏，后来也在回忆录中作出了沉痛、真诚的忏悔（见《记忆》总第42期《武斗“尸长”忏悔录》，2010年2月）。现在，又有了《雪地足迹》的作者徐正全。其实，徐正全与李乾和郑志胜相比，还有所不同，他既没有亲手杀人，也没有参与致人死亡的行动，只是作为造反派头头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为此被判死刑，确是有些冤枉的（有哪个领导干部因死了人的“领导责任”而被判死刑的吗？）。但他并不因为自己蒙受了冤屈而拒绝忏悔（而这正是许多拒绝忏悔者的理由）。因此，读到书中的有关文字时，不能不让人对作者肃然起敬。

曹承义为此书写的序中说：

最使我感动而且欣慰的，是徐正全对七二〇后工安公司“新一冶”几个人打死王荣炎师傅一事的认识。他在书中不隐瞒当时自己的漠视人命：王荣炎被打死后，竟“无任何内疚之感，好像这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一样，什么都没想。人命关天在这里失效了”，觉得“就那大个事”。若干年后，才从自己生存权被践踏，悟到了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被敬畏，不管你是重权在握、腰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挣扎在社会底层。

徐正全自己在本书的自序中真诚地写道：

我的人生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 1967 年七二〇事件后我们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的几个人殴打王荣炎师傅致死。这一血案是我永远回避不了的，因为它决定了我二十一岁至今的人生足迹，更是因为这个同事宝贵的生命就此毁灭，使其亲朋心底的苦痛永远挥之不去。对此，我这个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一号头头罪责难逃。

我曾经找出很多理由为我和我那些动手的兄弟们辩解：百万雄师以围攻造反派据点、抓人打人杀人为全部行动内容，在其两个多月生存期内血债累累，我本人就被他们抓过打过；王荣炎参加过百万雄师武斗队的行动，叫喊过对新一冶九八纵队的人见一个杀一个；七二〇后武汉三镇造反派报复百万雄师成员成为风气，我的那些兄弟不过是想教训王荣炎一下，并不想打死他……

这些理由成立吗？有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足以推倒这些理由：大多数身受百万雄师之害的造反派在七二〇后并没有实施报复。

另外，武汉公安机关军管会的判决不顾事实、别有用心、显失公正。我没有指使此事，也没动手，虽然制止不力但也制止过，最终被判死缓；张治能虽在现场但没动手，被判八年徒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军管当局和一冶当权派要在工安公司否定文革、整垮造反派，一定要找个理由把“跳得最高”的徐正全、张治能整下去。我确实有罪，一是部下犯了罪，头头就有责任；二是我就在现场，制止得再坚决一些是完全可以制止的。但这个判决按当时的法律也是极不公正的。

判决不公，是一个法律问题；走资派横行无忌，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的问题能抹掉我自己的问题吗？我在此案中的罪责也涉及法律和政治，但我在法律和政治上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吗？

王师傅被打死，为什么？谁之罪？一些人会不假思索地归罪于文革，这就是胡扯了。古今中外，民间私刑一直存在，去看一看 2010 年网络上广泛流传的组图“全球街头上演的争议‘私刑’”吧，看一看美国吧，马克·吐温曾经斥责美国为“美利坚私刑合众国”，现今击毙误入私人领地者仍然不负法律责任。在新中国，无论是文革前，还是现今“太平盛世”，民间私刑草菅人命的事一样发生。说文革时期特殊，哪一个时期不特殊？不特殊怎么会单独划为一个时期？把文革期间的民间私刑主要归罪于社会环境，什么领导责任，什么社会氛围，什么主流舆论，还可以找出一千一万条理由为施私刑者开脱，但忽视了最重要的一条：施

私刑者不尊重生命。

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并没有受到暴力威胁的情况下剥夺王师傅的生命，这就逾越了人类万世不变的道德底线，演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公法问题。在那一刻，我们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品质——善良，有同情心，爱自己的生命也爱别人的生命。中国人骂人有一句很重的话——“禽兽不如”，就很有道理。我们知道很多禽兽爱护他者生命的事实，也知道禽兽的残暴，但禽兽的残暴并没有超出生存所需的范围。而人的残暴程度、范围却能够无限扩大，这一点上人真不如禽兽。

王师傅在新一冶人的手里失去生命，给他的家人造成了永久的伤害。一想起这事，我就觉得抬不起头来，完全能够体会、理解王师傅的亲人、朋友，一冶的一些职工对我们的仇恨，我们应该向他们忏悔。希望我们毕生的真诚的悔恨能够一点一点地减轻他们的痛苦和仇恨。

从这段显然经过多年的内心煎熬、反复思考而形成的文字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作者忏悔态度的真诚。

在这里，徐正全有一个说法值得商榷，他说军管当局与当权派整他是为了“否定文革”。在那个时候，哪个当权派敢想到“否定文革”？哪个当权派不是竭诚拥护文革、唯恐被文革所抛弃所打倒？而军队的“支左”，军管，以及在军人主政期间开展的“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不都是毛泽东文革部署的重要内容吗？只能说，他们的有些作法是在否定造反派，但否定造反派不能说就是否定文革。众所周知，毛泽东就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他曾经欣赏和利用过的造反派，他通过1968年7月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训话和派出工宣队进驻首都高校，就已经否定了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通过将中学生全部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已经否定了中学的红卫兵造反派，通过在全国大张旗鼓地长时间清查所谓“五一六”，就已经否定了广大的特别是偏于激进一翼的造反派……而毛泽东所领导、部署的一切，却并不能说是在否定文革。

这本书的内容总体上是客观、求实的。不过，作为对往事的回忆，难免会因时间的久远而出现一些差错，特别是那些与自身亲历关系不大的史实。比如书中写到1967年初回重庆探亲时见到重庆因夺权而导致造反派分裂，把重庆夺权后引起两派意见分歧的“革联会”错记为“革筹会”（54页）；又比如，记叙到作者在重庆老家门前亲眼见到的重庆工业校被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克这一重大事件，把时间错记为1967年7月9日（70—72页），实际上这一导致重庆两派武斗升级为枪战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67年7月25日，因此史称“七二五”事件。

不过这些都是可以在再版时订正的小瑕疵。我接触到一些愿意回忆文革历史的亲历者，担心记不准一些具体时间，因而在回忆时有些畏难。其实，时间记不准不要紧，那是可以查核的，重要的是尽量回忆出自己亲历的那些史实，特别是有关的细节，那是不了解情况的别人和后人无法想象出来的，想编也编不出来的。

作为在文革中昙花一现般风光过一时却在更长时间里遭到打击、饱受歧视的

造反派，能够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历史足迹和相关思考写出来留给后人，不论其观点倾向如何，都是应予鼓励的。我曾对接触到的一些原造反派人士反复讲过我的一个看法：对文革亲历者来说，真正有价值的不是你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而是你亲历的那些史实。认识和评价，别人或后人都可以做（别人或后人的认识和评价也只能由他们自己去做），只有你亲历的那些史实，那些细节，才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才知道的，若不赶紧回忆出来、写出来，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别人或后人就再也不可能知道了。现在这样湮灭的史实已经太多太多了，太需要抓紧抢救！武汉的文革亲历者和帮助他们整理、出版回忆录的朋友们，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切实的努力和默默无闻的贡献，令人钦佩。但愿有更多的这类成果不断出现。

【文摘】

最初的造反足迹

徐正全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四清”工作队进驻一冶

转眼到了1966年5月初，我们正在上班，领导通知全体职工回厂前公司（注：“厂前”系地名，指武钢大门前的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大院，该公司总部在青山区工人村）开紧急大会。几百人集中到球场上（都是一队的人，其他三个队和加工厂可能是分别开会），站着听一个生面孔讲话。他讲话很简单，宣布“四清”工作队今天正式进驻，队长姓孙，副队长姓王，这是人员介绍。同时宣布，“四清”运动期间，一切人事调动冻结，所有公司的领导干部全部靠边站，由工作队行使公司的一切领导权。这后一条虽然与平头百姓无关，但仍让人感到一股杀气，我看很多老工人包括一些中下层干部都面面相觑，一脸的茫然。然后宣布散会，再回工地继续干活。至此，我的文革命运悄然降临了，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和许许多多与我一样的人都会像一粒粒砂子一样被这股政治浪潮卷进去，不知被卷向何方。

我絮絮叨叨，洋洋万言，从记事开始说到现在，无非是想对我在文革中的种种表现找到一条思想脉络，人生的路都是自己走的，而每走一步，几乎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仔细想来，都是有前因才有后果。文化革命为什么会有数以亿计的人那样心甘情愿地忘我投入，舍生忘死在所不惜？有人说是毛主席的号召，那么解放以来那么多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毛主席号召的？而人们并不都是自觉地投入运动，往往是“被运动”。毛主席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撕开一个个由党组织掌控的铁幕，让人们有自由结社、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人民群众的政治

热情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几乎闹得不可收拾。归根结底，是人民大众有话要说，有愿望要表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民大众有自己的诉求。几乎所有的老造反派都有一个共同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去造反，共同的原因是对当时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秩序不满，要力求改变那种现状，这才是群众一发就动、甚至不发也动的内在原因。我也十分自觉地随着文革的大潮闹腾了一番，尽管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但至今不悔。

从5月份工作队进驻以来，直到6月末，工安公司都没有什么大的动静，全公司连大会都没开一次，可能是工作队在做前期准备工作，诸如查档案、人员排队、扎根串联之类。于是大家照常上班、下班。我们是青工，又是初来乍到，没人关注我们，我们也没有感受到文革前紧张的气息。长这么大，第一次面临所谓的“运动”，一点感性知识都没有。

其间，一冶附近只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武钢综合经营厂工人庞玉来，被同厂四清积极分子黄连生贴大字报，说他曾被资本家收养。庞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小工人，又不是当权派，就撕下了大字报，与黄发生冲突，误伤一劝架女工。事发十几天之后，就被冠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罪名枪毙了。怎么个破坏运动的，不大看得出来。我们弄不懂，也不关心，只感觉这个运动原来阵仗还是蛮大的。

之后工作队发动大家写大字报揭发公司的问题，定的调子是有什么问题揭什么问题，不管谁的问题都可以揭，但工厂一再明确是搞“四清”，而搞“四清”那就肯定跟搞文革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工作队没有讲，反正就是搞运动了。工作队正式的讲法是工厂的运动在“四清”的轨道上进行。于是大字报一天天多起来，内容多半是张三上班磨洋工、李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之类，极少有涉及工段长以上干部的。所以运动也就显得风平浪静，平平和平。

青年人爱出风头，钻牛角尖，我算是自小就有这个毛病，于是就想，不是说“四清”主要是清干部吗，怎么在清群众？应该给干部贴大字报才是对的。刚来几个月，我们也不认得几个干部，公司一级的经理、书记，我们来了六七个月连面都没见着，自然无从去揭露。但听说我们队一工段一个姓张的工段长，是位年青的技术权威，他把新来的两个四川女青年奸污了，公司领导也没给他什么处分。于是我有了发挥的题目，洋洋洒洒写了四大张白纸的大字报。大字报内容不多，但言词都是咄咄逼人的，竟然敢质问工作组：对这种坏干部为什么不处分，是不是想包庇？不承想，大字报一贴出，居然得到不少人呼应。除我们三工段外，其他三个工段、一个加工厂也因此知道了四川青工中居然冒出一个叫徐正全的。这算是一冶工安公司开展文革运动的一次预演，从中也看出我投身文革和许多人一样，是从单纯幼稚开始的。

工安公司的“匈牙利事件”

至9月初，武汉的政治气候像自然界的气温一样逐日升温，湖北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到湖北、武汉串联的北京等外地学生），省长张体学在洪山礼堂当众

痛哭，控诉南下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一时成了江城尽人皆知的政治明星。一冶召开了声讨“南下一小撮”的万人大会，本意是想把赵桂林等“南下一小撮”搞臭。别人对此举的感受我不清楚，但我却感到“南下一小撮”造反学生的行动大快人心，把堂堂省长搞得如此狼狈，实在是很过瘾的事。那时不知政治为何物，只是本能地体会到共产党的大小官僚确实往往把人不当人。二十年来我在风雪中跋涉的生活经历，由这些经历所必然产生的渴望社会平等、渴望个体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朦胧意识，就像是一堆干柴，只等火星来点燃了。而像我这种状况的个体何止成千上亿，这亿万堆干柴迟早要被点燃。所以对张省长的痛哭及其对“南下一小撮”的无奈，感到本能的痛快，心想在瞬息万变的社会里，自己要是能像赵桂林们一样，那也不枉为男儿一场。

这些思想认识，当外界诱因足够大的时候，必然要在行动中反映出来，集中在一点就是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意。我不是对社会制度和共产党有什么不满，而是对具体的执行者、对当权派的一些个体不满。

我同班组有一位姓江的青工，我们平时就很谈得来。他有好几位高中同学在北京上大学，9月上旬给他传来许多北京文革的情况，他多次偷偷地讲给我听。听了北京文革的情况，我总的感觉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天翻地覆，好过瘾好痛快。虽然跃跃欲试，想一个人搞，一是觉得势单力薄，二是一个人闹没意思，况且也没有找到切入点。这时工厂还在搞“四清”，学生运动离工人还很远。武汉市青山区的红钢城街头，每天晚上自发成堆辩论的人虽不少，但大多对政治不着边际。

9月8号，机会终于来了。上午听人说我们来汉的二百多名青工都是合同工，只有个别人与一冶签了劳动合同，而一冶当局将真相死死地瞒住我们。我和小江一合计，这是个好借口，牵涉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先借这件事做文章，闹它一回再说。我找来纸笔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旧社会卖身契还让本人画押，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大的事，竟然瞒着我们几百个当事人，我们要一冶当权派给我们一个明确答复。大字报写好后找人签名，一是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二是自己平时人缘还不错，没想到是一呼百应。当天下班后，我拿着近百人签名的的大字报，直接找到队党总支书记，要他向大家说清楚。我们明知他说不清楚，目的就是要惊动上面。

果然，不到一小时，工安公司头头还有一冶总公司的处级干部下来了一大排，把我们请到会议室扯了个把小时，不得要领。最后我提出，明天下午5点前总公司要给我们一个明确满意的答复，否则我们就上街，去向总公司讨说法（工业安装在厂前，一冶总公司在八大家，相距十多华里，中间要经过青山区的闹市红钢城）。

第二天我连班也不上了，组织人书写、制作横幅和三角小旗。一切准备就绪，下午5点总公司没有动静，只听到哨子一响，我们一百多人工装未脱，整齐列队，打着制作好的横幅，上书五个大字“炮打司令部”，喊着口号从厂前出发，公司头头前来劝阻没人听。游行队伍唱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继续前行，人人手执三角小旗，高呼口号向红钢城进发。我们的队伍说不上气吞山河，倒也是豪情

满怀。

一到总公司，队伍直奔二楼大厅，数十名总公司各级干部迎上来，听说我们要见总公司党委书记徐扬，二话不说即去通报（其实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一百多人整齐划一，听到口令，一起齐刷刷坐在大厅地板上。

徐扬由两人搀扶着出来，恭恭敬敬接下大字报说：“大家辛苦了，走了这样远，连水都没喝上。大家先回去，总公司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一看，我们这次行动本来就是造声势，没打算会有什么答复，戏已演完，见好就收。于是列队返回，一路上全体高唱《打靶归来》，一到公司大院，大小头头均出院迎接，食堂早已准备好稀饭、面条、包子，比平时夜餐还好，而且是免费的，大家都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第二天工段支部书记碰到我说：“你们还真不简单，我来公司五六年了，还没见过党委书记徐扬，你们一去就见着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群众的力量。

好景不长，五天一过，总公司答复没等到，等到的是通知我去公司开座谈会。名曰座谈会，其实是帮助我“改正错误，提高认识”。虽没让我站起来低头挨斗，但气氛是货真价实的批斗会。一时间四五十号人齐声声讨“小邓拓”，什么“工安的匈牙利事件”，“和‘南下一小撮’上下呼应”，帽子满天飞。我既没感到害怕，也不想申辩，坐在会议室看他们表演，过一天又增加了两个人陪斗。搞了三天，看来他们也觉无味，工作队也没公开表态，事情好像有点不了了之，这反倒是我不愿看到的结果。

拖到10月底，又通知我开会，这回工作组组长（武钢炼钢厂党委书记）孙哲民直接表了态，说：“9月8号、9号的行动大家虽有缺点，但不算大错误，帮助会上的说法过头了，有的说法是错误的。”我知道北京早就开始赶工作队了，估计工厂的工作队也长不了，所以我这时反倒不依不饶了，要求工作队向全公司职工大会澄清我和“九八”行动的性质问题，并作出公开检讨。他们说这恐怕不行，要请示上级。我回来后给大家一通气，大家都很高兴。下一步怎么搞，我和几个人一合计，上省委告工作组，一来给他们施压，二来借机会到社会上去了解一下运动的动态。

11月8日，我和工作组打了一声招呼，我、张治能、费开学、李斌四人带着一百多四川青工的期望到了省委。到省委接待站一接触，他们收下了我们的上访材料，免费餐券照发，问题解决不了。于是我们四人在省委大楼乱串，饿了反正有饭吃，困了就席地而卧，反正都是木地板，天气也不冷。

我在“工总”的日子

好像是11月8号下午，在8号楼，见一房间门口摆一书桌，上有一本子，门口贴着“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筹备联络站”字样的纸条，桌后坐一人，身体不怎么好，是一种病态的样子。一问他们，是在准备筹建“工总”，可报名参加。我一看登记簿，大约有四五十人登记，就说我们也报名参加，于是将我们一行四人名字登上，然后大致说了我们的单位，方才知接待登记者大名余克顺（工

总早期负责人)。到10号上午,我们还没离开8号楼,余克顺找到张治能,通知晚上六点到省委洪山礼堂开工总成立大会。

于是四人赶往洪山礼堂,我们都是外地人,来武汉不到一年,除了青山红钢城、厂前一片外,武汉什么地方都不熟。七问八问,好不容易找到洪山礼堂,已经七点多钟了。挤进会场,见主席台上一人在向另一人授旗,于是问边上的人:那个授旗的人是谁?回答是张体学张省长。又问接旗的人是谁,答不认识。心想这下好了,省长授了旗就表明承认了我们组织的合法性,表示是支持我们的。再看台上其他人,当然一个都不认识。

张体学授完旗好像就走了。接着是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讲话,他很明确地告诉全体与会者,省委不能承认工人总部这个名称,要改成联络站,好像也没说什么理由。这一下人们感觉被愚弄了,加上失望,会场一下子就乱起来了。这时不知是谁策动,台上有人对着麦克风叫:“我们到北京去告湖北省委!”这一来,“到北京去,到北京去”这个声音就逐渐压倒了其他的叫骂声,一下形成了全场的共识。不知是哪些人带头冲出会场,人群蜂拥跟随,我们四人也随着人流一齐跑,分不清东南西北,七跑八跑,一看竟到了武昌南站。

冲进车站内,正好站台边停有一列旅客列车,也不管是朝南开还是朝北开的,一群人分别钻进了各节车厢。我们四人钻进一节卧铺车厢,找地方坐下,等待勤务组下一步的通知,反正一定要去北京。尽管是严冬季节,脱得只剩内衣短裤还是热汗直流。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各单位按照省委指令陆续来人把自己单位的人接走,但直到11日下午5点多钟仍有一百多人坚持在车上,这趟列车也没有开动。近二十个小时,当时工总的勤务组几乎无任何决策向大家公布。这也难怪,头头们都是一群平头百姓,无任何领导组织经验,对这种突如其来、人多嘴杂的事情多少有点不知所措,且少数人还缺乏自我约束的能力(这种情况到北京后尤甚),这是群众运动初始不可避免的盲目性。

天黑下来了,我正闭目养神,猛然听到有人喊:“快快下车,有行动!”我也随之起身胡乱穿好衣服,四人随人流直奔车站外而去。一阵快跑终于在小东门铁路桥下停了下来,只见两个人怀抱一大抱袖章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准备去北京告状,愿意去的领袖章,然后自己爬车或者买票去北京,到北京后再联系会合。”我们四人各领了一个黄字红底的袖章,袖章上的字共有三排,上面是“毛泽东思想”,中间是“战斗队”,下面是“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12日,四人买票乘火车去了北京。到国务院接待站方知大队人马已经往白石桥社会主义学院集中,第二天几经打听方找到该处。我们四人与肉联(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的谭光前等三人被分在一室,一共七个人。一日三餐吃饭免费,晚上有暖气,可不用被子席地而睡。如此近一周时间,无人问津,虽聚众二三百人,但多数互不相识,更无来往。我们只是每天出去看大字报,都不知现在该做什么,怎么做,心中自是彷徨不安。好在我们有一台新油印机和一大捆白报纸(因为我们一冶是中央直属企业,可以到冶金部去申领这些东西),抄了大字报回来刻钢板翻印,倒也有事可做。但多数人没有这个条件。俗话说无事就要生非,几

天下来，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对勤务组多数人都还不认识，又无任何动静，各种消极情绪随之而生。

一日，听说在会议室开大会，看来勤务组有动静了，我随人流进入一会议室，只能容纳百十号人，有站有坐。我刚在后面站定，一行四人上了主席台，只知其中一人叫李洪荣（武汉锅炉厂工人），在四人中走在第一个。李洪荣坐下正欲开讲，右面进来一帮人，多半是武重（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冲主席台上四人大声指斥，似对其“领导权”产生了极大的疑问。于是会场乱了起来，会没法开了，几分钟后，大伙一哄而散。

不一会儿，有人来房间通知谭光前和我前去开会，原来是湖大（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红八月”的陈春茂同学召集武汉地区几个大单位的代表开会，有肉联的谭光前、武重的朱鸿霞、一冶的徐正全，武钢一个好像是姓马的（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工人），另外还有一个记不得是哪个单位的了。陈春茂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说：“你们都是武汉市几个大单位的代表，现在的情况你们已经看到了，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人心一散，什么事都做不成。现在我们成立一个临时的六人小组，负责在北京这一段的工作。”这个决定既没向大家公布，也不知是否是勤务组在京成员的决定，几位参会者自己都没真当回事。依我看，陈春茂在工总人员赴北京期间确实在主持大局，工总勤务组这期间有何动作，与陈春茂是何关系，不大清楚。工总刚成立，又是跨行业跨系统的组织（工总的参与单位有中央在汉企业、湖北省属企业和武汉市属企业），勤务组也不可能由参与者民主推荐，参加的人多且杂，加之组织经验缺乏，所以上下脱节也是正常的。但是陈春茂多数人是认识的，加之又是学生，大家对其政治背景比较放心，所以在白石桥期间，陈春茂实际上起着领导与组织的核心作用，而他确实是一个真正和工农结合的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现在回过头来看，陈春茂、聂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新华工头头之一）、赵桂林都是对武汉文革有重大贡献的学子。

大家正商议着下一步怎么办，有人送进来一份传单，是陈伯达对上海安亭事件给上海工总司的表态电报，大意是工人要在本单位闹革命，阻断京沪线是错误的，等等。六位参会人一传看，个个倒抽了一口凉气，这真是直指了上京造反派的软肋，完全否定了工人上京告状的合理性，更不用说合法性了。怎么办？看来真是逼得人走投无路了。这时送传单的人又反映了一个信息：“前几天河南来京的人员冲了中南海，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大家心里都清楚，只要中央首长接见了，非法就会变成合法，这是摆脱困境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来北京也是这个目的，不但我们武汉的工人造反派是如此，恐怕全国来京的工人造反派也多是如此。

这时我提出，那我们也去冲中南海，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因为这之前我就听说我们四川的造反派冲过一次中南海，所以这个念头也不是一时冒出来的。这一提议其他五个人立即表示赞同，因为除此险着外也确实无路可走。

意见一致立即行动，陈春茂提出从各单位抽人，一共组织三四十个身体比较好、年青一点的人；不是万不得已，不去冲中南海，就在大门口静坐。我接着提出，因为是静坐，就要先把目的和要求亮出来，要先准备两条标语贴在中南海的

红墙上。陈春茂和朱鸿霞问，标语怎么拟？我说拟两条就行了，一条是“陈伯达同志 11 月 11 日的电报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另一条是“我们强烈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

大家随即通过。正准备散会去组织人，我又提出两个问题：如果中央首长接见我们，谁去谈，怎么谈？如果陈伯达还是电报里的这个态度，我们怎么说？陈春茂说，如果中央首长能接见我们，要谈当然是我们六个人去，至于怎么谈，大家发表意见。众人一时沉默下来。真的怎么谈，大家一时还没想好。我说：“我的想法是不是这样谈：就说我们这次上京告状的三百多人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有许多老工人，有的还是劳动模范，多数是中央直属大企业的产业工人。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脱离生产岗位，实在是被湖北省委逼得没有办法，他们一再拒绝我们的合理要求，打击、迫害我们，我们万般无奈，我们实在是无路可走，只有上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求救。我们实在不想脱离生产岗位到北京来，所以说错也是湖北省委的错。”

大家议论一番觉得可以，于是开始行动。陈春茂即刻去通知各单位抽人，其他成员分别落实各单位具体的人。后来参与此次行动的四十个左右的人中，有我们一冶的四个，肉联的三个，武重大约有十多个，还有武锅、武钢等单位的人。

半小时以后就出发了，工总勤务组没有也不可能有时间去讨论，因此最初去中南海的动议和策划，肯定是我们这六个人议定的，并不是工总勤务组的决定。四个多月后武汉军区《三二一通告》把“冲击中南海”说成工总勤务组的决定并以此定罪，实在是冤案一桩。李承弘同志回忆录《百年寻梦》（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0）关于这件事的记述也容易使人产生这种错觉。参加陈春茂所召集的会议的这六个人才是始作俑者，而这六个人除朱鸿霞外，无一人是工总勤务员。

来到中南海西边的一个门，在门两边贴上用报纸写就的两幅大标语（一张报纸一个字），左边是“陈伯达同志 11 月 11 日的电报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右边是“我们强烈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四十来人开始站在大门外，这时中南海的警卫由开始的四人增加到十多人，没有任何人理我们，只有一些过往群众边看边指点墙上的两条标语，也没有什么人围观。大约不到一小时，陈春茂要我们到国务院接待站去解决问题。其实我们来京的第一天就去了国务院接待站，那里只接收材料不解决任何问题，我是已有领教，就懒得去了，只叫张治能随他们一起去，我则回了白石桥招待所住地。

同样的，所谓第二次冲击中南海也不是工总勤务组的决策，更不是王光照（武汉锅炉厂技术员）的什么大会发言造成的，王光照根本没有在 11 月 26 日“全国在京革命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发言，此事的始作俑者仍然是上述六个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这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据说是首都三司抑或是北航红旗组织的。会议前三天，陈春茂召集六人开会传达了这个消息，并称大会由武汉造反派担任警戒纠察，主要是防范河南来京的一股人闹事。大会并规定各地区大会发言一个人限十

五分钟，武汉有发言任务，并指派我负责整理发言稿。陈春茂一共给了我六七份材料，价值都不大，我们带去的四份材料又不太典型。最后陈春茂拍板，就用汉阳造纸厂的一份材料。但材料很零乱，细节也交待不清，我就勉强整理了一下，内容是汉阳造纸厂工作队逼死一个工人的控诉材料。陈春茂还说此次中央首长会亲临大会，等于是接见我们。虽然是“等于”，也是聊胜于无，何况拉大旗作虎皮本就是文革常用的招术之一，于是大家都很高兴。

开大会的当日下午一时，首都三司派出的六七辆大客车准时来白石桥接武汉造反派，三百来人在大院内整齐列队，准备出发。六人中的陈春茂、朱鸿霞、谭光前、我，又拉上一冶的张治能，在出发前最后明确一下任务。这时我问陈春茂，今天中央首长是不是真的会来？陈春茂说一定会来，我说万一不来怎么办，陈春茂说会来的。这时朱鸿霞、谭光前也有同样的疑虑，陈春茂一时沉吟起来。我说：“这样，今天中央首长来了最好，万一不来。我们到时让张治能冲上主席台去抢话筒，号召大家一起去中南海请中央首长。我们是去请中央首长，不是冲中南海。”时间不等人，陈春茂、朱鸿霞都明确表示：“好，就这样办。”于是车队出发。

下午两点多，大会开始，全国各地代表陆续上台发言。四点多了，中央首长不见踪影，台下开始骚动，可能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得到通知说中央首长要来参会。这时一学生上台宣布，中央文革关锋同志打来电话：“因工作太忙，一时来不了，祝大会顺利成功。”也没说还来不来。学生说他们会再去催。大家疑心被忽悠，但又只能耐心再等。发言继续，一晃大约六点过了，天早黑了下来，会场上再次出现骚动，而且越来越严重，那学生作了几次解释，明显让人感到底气不足。这时台上正值上海代表发言，发言者拿着一件血衣在向大会控诉。陈春茂、我、朱鸿霞和张治能均坐在会场主席台下第一排，王光照、鄂世纯手执工总大旗，站在紧邻我们座位边的主席台下。我看到会场渐要失控，低声吩咐一冶的张治能乘人不备冲上台去。张治能冲上大会主席台，一把夺过发言人的话筒高声喊道：“全国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中央首长答应参加今天的大会，到现在还没有来。我们现在一起去中南海请中央首长！”

话声尚未落地，全场像冷水泼进了滚油锅，一下炸开了，王光照、鄂世纯心有灵犀，即时舞动手中的工总大旗，全场响起了“请中央首长”的喊声，一刹那，由武汉工总的大旗引导，后面跟了几百上千人，先绕会场走了半圈，从侧门一涌而出，直奔中南海，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是武汉工总的。张治能一口四川话，谁也不知道他是哪里的。我因患重感冒，实在不舒服，没跟着大队去中南海。

后来我和张治能从北京回汉后组建了一冶野战兵团，再后来并入“新一冶”，故武汉部队1967年3月镇压工总时并没有找他和我的麻烦，这笔账又糊里糊涂地归到工总勤务组的头上，连李承弘同志的回忆录也这样记述。虽然两次事件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是工总成员，但始作俑者则绝不是工总勤务组，工总勤务组也应是部分地负有责任。这两件事在工总气壮山河的全部文革活动中尽管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片断，但却是工总赴京告状的近三百人二十多天里仅有的两次自己主导的行动。本不足道，但却被陈再道之流列为工总的一大罪状（冲击中南海），

为辩沉冤，为正视听，故笔者有此记述。

毛主席 11 月 27 日的接见（注：此说有误。毛泽东第八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是在 11 月 25—26 日，《人民日报》27 日报道）大多数人都参加了，此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的接见部分人也参加了（我患重感冒睡在白石桥招待所，毛主席接见没参加成，只听张治能描述了一番，至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接见当时连听都没听说过），加之全国大的政治气候已经明朗，上海安亭事件后，随着中央对上海工总司的承认，工人成立群众组织已经合法，我们待在北京已无事可做，于是决定全体返汉。

12 月 2 日下午，陈春茂、朱鸿霞通知我说，准备成立一个驻京联络站，办一份赴京战报，打算留我和张治能在北京，告诉我留下来的人还有胡厚民，并带我去了一间有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室内一办公桌上放有一本油印的学习材料，封面写有“胡厚民”三个字，我一看字写得挺漂亮的，但胡厚民长什么样不清楚，只听说是个党员，具体人对不上号。我们在北京期间，我只认识朱鸿霞、李承弘，与本人对得上号的只有刘传福（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总头头）、王光照、姜诗存（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总头头）。当然比较熟悉又有交道的就只有陈春茂和谭光前了，我们和肉联厂去北京的谭光前三人还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合过影。我们一直到 12 月 4 号都没和胡厚民照上面，工总勤务组也没有给我们具体的布置，于是决定 4 日返汉。

5 号晚上乘火车回到武昌南站，我记得是李承弘来接我们的，因为他和张治能熟一些。路上，李承弘说，现在形势真的一片大好，短短几天工总已经发展到十多万人了，连黄石、应城都有工人来参加。我当时听了心里格登一下，心想一下子如此膨胀，肯定泥沙俱下，不见得是好事（我自己书生气十足，不懂得革命人越多越好的道理，也不太愿意出头露面）。我们一行人到了省委 13 号楼（具体楼栋记得不太清楚），进房间后，李承弘从壁柜里取出两床新的白布套棉被，说晚上就铺在地板上睡，明天再作安排。我一看雪白的被子，觉得弄脏了挺可惜的，就推辞了，说我还是回厂看一下，过天把再来。当晚单位来一辆吉普车把我和张治能送回厂前。张治能带回一面工总的旗帜，说是成立大会上张体学授的那面旗，他还说以后这就是文物。回厂后忙于批判工作组、联系同志、汇报北京情况，这期间一直未与工人总部联系。

转眼到了批斗王任重的日子——1967 年元旦。前一天我叫张治能与工人总部联系，到时候给我们派三辆车，我们组织了二百多人，可喜的是有不少老工人参加，张治能回来说工人总部答应了。可是到了当天早上，七点多钟人全部到齐，数九寒天站在路边望眼欲穿，到九点车不见影子，人冷不说，第一次组织大家参加活动我们就失信于人，那份焦虑、难堪，真是无法形容，又无通讯工具可以联系，只有干生气干着急。我们一下子对工总信心全失，原定我们工安公司造反派全体加入工总，然后再串联一治其他公司，现在一下灰心了，干脆自己干。

加入一冶野战兵团

接下来三天，我们紧锣密鼓成立起自己的组织——毛泽东思想野战兵团，工业安装公司这批人就叫野战兵团九八纵队，一治其他公司的造反派如果加入我们兵团，再按一个单位一个纵队取名。成立当天，近三百人在公司礼堂开成立大会，朱鸿霞坐着一辆“三马”（三个车轮带车厢的摩托车）宣传车来表示祝贺，就他一个人一个司机，谁与他联系的我至今没问。会上他代表工总讲了话，我留他吃饭，他说要走，想和我单独谈一下。我陪他上厕所，一边走一边谈。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总部，和我们一块搞？”我说：“还是在本单位搞比较好。”他说：“那也没有必要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嘛！”我借口总部离我们太远不好联系，朱鸿霞说要不这样，你牵头成立工总青山分部，或者一冶分部也行，有困难我们支持你。我不想深谈，也不想谈对总部的失望，只说我还是只想在本单位搞。他很无奈地说：“你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实在不行那再说，反正都是老造反派。”然后我就送他上车走了。

事后我向野战兵团勤务组通报了朱鸿霞的想法，有部分人（主要是未去北京的几个人）还是倾向参加工总或是别的全市性组织，觉得那样力量大些，信息面也广些。我们去北京的四个人都不赞成回工总，恐怕跟我们在北京一段的经历有关。这时，我决定和武钢九一三筹备组的人接触一下，于是派了胡连生（工安公司三队工人，造反派普通成员）去参加九一三的筹备活动。一连几天带回的消息都不好，首先是赴京派与留守派矛盾重重，而留守派的白玉柱是筹备组的主流派，李想玉等赴京派的人成了非主流派。我问是什么矛盾，回答说是争位子，双方都要在勤务组占主导，结果发展到抢章子、争旗子，闹得很僵。后来又听说我们公司的朱元跃要当宣传部长，我听后笑说他都能当宣传部长，那我去当一号勤务员都觉得委屈。这当然是开玩笑，结果大家一致决定还是在自己本单位搞。

“二八声明”发表前，听说一冶总公司也成立了一个组织，正好也叫野战兵团，于是我们勤务组有打算和他们合并，这一次是由我自己出面去考察联系。接触的第一个人正是曹承义，还有杨连洲。曹承义在我们眼里是知识分子，谈吐自是不俗，且待人接物热情诚恳。杨连洲一老工人形象，很实在的样子。当天去一谈就成，又是本单位，符合我们立足本单位闹革命的主流倾向，于是当场就决定领几百个一冶野战兵团的袖章，一夜之间易帜，我们加入了一冶野战兵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冶野战兵团中工业安装公司分部的确是支柱之一，因为工安公司几乎是野战兵团全覆盖，除少数保守派外，参加工总和九一三的只有几十人，近二千人中大多参加野战兵团。九八纵队又是工业安装公司分部的支柱，其骨干是重庆来的一百多青工，而且都来自于沙坪坝区和大渡口区，多半是才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单纯胆大，单身无牵无挂，既有精力又有时间还不缺胆量。年青人在一起相互激励，争强好胜，随放在哪里都能释放出其最大的能量，最终成为一冶文革的一只出头鸟是必然的。

批判工作队

我们北京之行的最大收获是开阔了眼界，练大了胆子，第一次知道了毛主席

《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内容，我们投入文革的愿望和行动由非法变成了合法，转折点是张春桥对安亭事件作了和陈伯达截然不同的结论。既然我们登上了文革这辆战车，那就只能有进无退。

12月5日晚上抵达武汉，先到省委13号楼再回到厂前的工安公司，已经快夜里十点钟了。我叫醒几位铁杆，连夜写出大幅标语，一晚上贴满公司大院。大标语的内容无非是彻底批判资反路线、工作队滚出工安公司之类。我们还把从北京带回来的一大捆在京翻印的传单（都是极具煽动性的那种）分给大家，准备6号晚上用。

我回来就知道，6号晚上公司文革筹委会要召开全公司的批判工作组大会，当时就和十多个铁杆商量好了6号晚上大闹会场的方法、步骤和参加人员，一夜无话。

6号一早，公司大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让全公司沸腾了，相同观点的自然兴奋，纷纷来打听我们去北京的种种情况。多数人则感到很震惊，没想到这几个家伙去了一趟北京，回来闹腾出这么大的动静。6号下午5点半钟，全公司大会准时在公司大饭堂召开，一千多人把饭堂挤得水泄不通，主席台上坐了两排，都是公司级领导和工作组的领导。文革筹委会主任罗长炎宣布批判大会开始，话音刚落，我们头天晚上布置好的上百个人一齐冲进会场。我和张治能、费开学、李斌四人冲上主席台，费开学挥舞工总大旗，其余台上台下的人一齐向会场上撒传单，人们开始一愣，随即都站起来抢传单。我则冲到罗长炎面前抢过话筒大声叫到：“今天是批判工作队的大会，工作队是批判对象，孙哲民、王××滚下台去！”主席台上的人也真听话，首先是工作队的人，然后是公司领导，一个个灰溜溜地下了台。罗长炎上来问我：你们打算怎么办？我说从明天晚上开始，由我们来主持召开全公司职工的批判工作队大会，罗长炎同意了，当场向全体职工宣布了这个决定，并宣布今天暂时休会。

第二天下午5点半准时开会，人比头一天好像还多些（头一天工安公司加工厂因为地处工人村，离厂前较远，只来了部分人）。会议开始，罗长炎宣布今天的大会由徐正全同志发言，台下掌声整齐但并不热烈，属于例行公事那种。我会前并无准备，只带上我们向省委控告工作队的那几份所谓材料，实则就是个提纲。我从来没在这样大的场合下讲过话，这是出娘胎以来的第一次。说来也怪，怕是应了福至心灵那句话，我从上台一开始讲话居然不惊不慌，我平时说话语速较快（重庆人都有这个毛病），也爱冲动，那天居然很自然地掌控着语速，也不看稿子，就这样不疾不徐讲了整整两个小时，内容自然也少不了强词夺理那一套，但居然讲得理直气壮，大义凛然，最后来一句：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批判发言暂时到这里。这一次全场响起了持久而热烈的掌声，同观点的人自然出于兴奋、赞同和鼓励，我观察绝大多数人鼓掌并不是因为我讲得精彩，更不是因为我讲到他们心里去了，更多的是对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势的惊喜，不由自主地认同竟然有人敢于指斥连公司当权派都十分畏惧的工作队。解放十七年来当官的第一次亲身领略了百姓对他们的当面指责，不是不疼不痒的批评而是痛快淋漓的批判，就像我们

听到省长张体学被南下学生整得痛哭流涕一样过瘾，尽管那还是我们间接所闻的感受。如是者我讲了三个晚上，大家饿着肚子，劳累一天后坐在枕木上非常热情地和我一起度过了三个晚上。

第三天晚上基本上是群众递条子提问，我一一作答。几十张条子基本没有质疑我批判发言的内容，多是一些能让我进一步发挥的提问，我每答完一张纸条的提问，下面往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是什么原因？不是徐正全能讲或讲了什么真理之类，而是我代他们宣泄出积压很久的情绪，反映了老百姓有话要说，他们不是群氓，他们是人，是希望自己能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的一群工人。正如《让子弹飞》中的隐喻，人民大众靠金钱甚至靠枪支都不一定能发动起来，只有杀了黄四郎哪怕是他的替身，才能把百姓的怒气泻出来，把胆量激出来。当权派的威权、操控的确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的锋芒所指代表了人民的心声，文革就是人民的节日，革命就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我三个晚上发言的效果不错，就自己而言，平生第一次得到了平时不可能经历的锻炼，扬了眉吐了气，更重要的是影响和发动了一批老工人和武汉籍的新工人。很多老工人主动找我谈话，有的说你们还真不是瞎胡闹，干的是正事；有的说小伙子讲得不错，是以理服人；有的说你的发言除了说工作队不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有点不实事求是以外（因为我们每星期都要学习三次），其他的讲得都能服人。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组的生产组长，一位抗战末期在山东老解放区入党的老党员，姓孙，他个子很小，是起重工，一天到晚干活不知疲倦。他常常在干活一段以后叫大家从高空或工作台下来，招呼大家坐下来凉快一下或者喝点水。大家都休息了，这是正常的工间休息，用我们重庆人的说法是“三抬四歇”（毛主席都晓得），但他基本不休息，而是默默地为大家休息后的工作准备工具或者清理现场。有一次费开学跟我说孙师傅不愧是老共产党员，干活这么积极，觉悟确实高。我说觉悟高是一方面，主要是他天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觉悟只能管一时管不了一世，只有人的本性难移，可以管一世。你信不信，他现在为共产党干活是这样卖力，日本人来了他一样会这样卖力，这既是很多中国老百姓的优点又何尝不是一种弱点。就是这个孙老头，一天休息时破例把我拉到一边，很诚恳地跟我说：“小徐呀，你批工作队，不能说不不对，但是哪天政策一变，像1957年那样，你就吃不完兜着走了。我劝你还是注意一点，你年轻，还没经历过五七年。”我感觉一时半会也给他说不清楚，只好含混地说：“好，我以后注意。”当然他并无恶意，甚至是好心，但这也反映出当时一部分中国老百姓对文革的心态。

批判工作队搞了三天，方式很文明，既没要他们上台，更没有给他们戴高帽挂黑牌之类，只让他们坐在台下第一排听批判，三天后就再也没有搞过。不几天工作队王队长约我一起谈一谈，一见面，他做出很沉痛的样子对我说：“小徐同志，孙哲民同志回单位去接受批判去了，他委托我代表工作队向你作检讨，诚恳地向你道歉。”然后就没了后话。一阵沉默之后，他稳得住神，我却沉不住气：“算了，其实工作队又没整我，也没斗我，对我谈不上道不道歉。问题是既然你

们要承认错误，就要向群众说清楚你们错在哪里。”他看了我半天，说：“哦，错在哪里？我们都受党教育多年，都懂得一条原则，宁犯政治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说实话，当时还没完全弄明白是什么意思，心里想，王队长大概是说下一级的干部只能按上一级领导说的去做，不这样就是真犯错误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我只理解到这一步。心想，难怪他们一个个都怪委屈的，我本来对工作队就没有什么成见，听他这样一说，更感到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问他：“那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王队长说：“一面等上面指示，一面接受群众批判。”我心想，还有什么批的嘛，该说的都说完了，再批也是炒现饭，没意思。心里想但没有说出来，只说：“那你们就等上级的指示吧。”

过几天工作队撤走了，对手走了，我们对下一步搞什么、怎么搞一片茫然。当然事还是有做的，一要上班，二要筹划成立组织。

到中南局告状

这时又一波浪潮来了，街头流传陶铸的一个讲话，主要精神是工作队（组）整群众的黑材料要一律销毁，不许隐瞒、转移和私藏，有违犯者要开除党籍。于是工安公司野战兵团开始抄相关的公司办公室，还搞过一次抄家。我忘记了是谁告诉我说，公司搞过专案的戎宝福家里藏有黑材料，于是我带着十多个人抄了戎宝福的家，我在文革中就抄过这一次家。我不认识戎宝福，去他家里一看，原来戎宝福是一个瘦瘦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知识分子。戎宝福很配合，我们也很文明，但也少不了翻箱倒柜，只是没乱扔东西。我们把翻出来的东西静静地看了一遍，再放回原处，什么也没抄到，当然什么也没带走。

后来别的地方说抄出了不少黑材料，且涉及到几个具体人（详情记不得了）。于是我们决定去广州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反映情况，并要求开除这几个当事人的党籍。征得当权派同意（否则财务不会给报销差旅费，那时坐火车不要钱但吃住是要钱的），我带了上十个人去广州。

1967年1月4号到了广州，早上四点一下火车，第一次领略到了南国风光，果真大开眼界，到处是一片绿色。在武汉上火车时还是一片茫茫大雪，又是棉衣又是毛衣，外加雨衣，一到广州，穿一件毛衣足矣。我们到事先联系好的中南冶金设计院招待所住下，因为这个设计院和一冶是一个系统的，住宿费每人一天四毛钱，买餐票进餐，估计一天六毛钱。招待所离毛主席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很近。第二天下午一觉醒来，穿着单衣单裤上街，那叫一个神清气爽，真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接下来几天几经打听，知道武汉学生三司红卫兵在羊城极有势力，中南局的领导都被他们控制着。三司学生看在武汉同乡造反派的面子上，答应给我们引见中南局领导，并告诉我们，代理第一书记陈郁病了，见不了，第二书记吴芝圃不在广州，只有见第三书记金明。我想管他是第几书记，只要见上就算不虚此行，回去有个交代就成，三司学生和我们约好过两天安排接见。

第三天中午刚吃完饭，三司同学叫来一辆军牌的吉普车，让我们去四个人，

他们不去人，由司机保证接送。我和张治能、华永新等四人上了车，上车后发觉后面还跟了一辆车。一出大院，两台车在广州市区东转西转，大约转了一个多小时，神神秘秘的。于是问司机为何兜圈子，回答说怕有人跟踪。三点钟过了才一溜烟开出城外，去哪里，我们没问司机也没说。直到五点多钟才见前面一片小丘陵，满目翠绿，迎面一“从化温泉区”的大牌匾。沿洁净的水泥路上行，远见一彩虹型跨溪桥，桥边一亭上书“滴翠亭”，系郭沫若手书，再看门匾上“流溪温泉”四字，似朱德或董必武手书。过桥见一栋两层精舍，为流溪宾馆，我想起来了，此处系当时常见诸报端的亚非作家协会的办公地。我的第一感觉是当权派真会找地方，真会享福，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风景，这么好的建筑群，四处假山园林，人工小溪，花红柳绿，楼台亭榭，真个是人间仙境。进得宾馆，一人发一条新毛巾一块香皂，由个个英姿飒爽、穿军大衣的十八九岁的女军人分别带至四间客房，不是睡觉是去室内洗温泉澡，然后用餐，等首长接见。洗完澡，小军人带我们去用餐，估计是首长的小餐厅，因为桌椅不多，显得十分宽敞，且窗明几净。二位女兵招呼用餐，四人坐一小圆桌，上置六盘菜，分量均不多，一高脚圆盘盛满米饭，一人一套碗筷，四双公筷，高脚大杯盛的冷开水一人一杯。不知此水是喝的还是漱口的，我们正口渴，端起就喝，也无人制止。六个菜一个也叫不上名字，好像都是素菜，没有吃肉的感觉，但十分可口。尤其是那饭，味道简直好极了，我第一次吃这种米，不知其名，一个人不要菜吃三碗不成问题，可惜一人只有一小碗。菜没吃到一半饭没有了，于是请女兵帮忙再添一盘饭，回答说没有了。问什么意思，答饭菜是配套的，这是四人餐，要加饭就须再上六盘菜。张治能说可以，那就再上一份。女兵说，再上那就要由你们自己付费了。我问多少钱，女兵很随意地说六十元。我一听，天哪，我两个多月的工资。其他几个人也听清楚了，四个人不约而同放下饭碗，夹着尾巴悻悻地逃也似地离席而去。如果说这个才叫生活，那我们平常人过的日子叫什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平常过的日子才叫生活，这里的日子又叫什么？眼下还是在文革期间，是当权派受苦、被人民逼得恨不得抹脖子上吊的日子，尚且如此奢侈，那平时呢，鬼知道。这样的日子任谁也不愿放弃，包括你和我，为了不失去或者夺回曾经拥有的天堂，把你整得死去活来，跟你拼个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容易等到十二点，首长到了，在小会议室接见我们。金明，五十岁左右的样子，穿着黄呢军衣和草绿军大衣，瘦瘦的，好像说的江西话，但我们能听懂。金明首先要我们汇报来意，他很耐心地听我一个人讲了大半个小时，不时插话，最后问我们具体是什么要求，看他能做什么。我说要求按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开除那几个私藏、转移黑材料的相关人员的党籍。金明说开除党籍要遵守一定的组织程序，要履行相关的手续，而且要从支部办起。我说你可以下指示嘛，他说那好，我给你们写一封信给张体学同志，让他来责成你们单位落实。于是女兵拿来一本信纸，金明抽出他身上的大笔杆黑色钢笔，用蚕豆般大小的繁体字写道：“体学同志：一治工业安装公司的同志来反映他们单位私藏黑材料的事，请你按有关规定了解后督促处理一下。金明”。最后署上时间。写完让我们看了，还认

真地问：“这样行不行？”我们不知道行不行，但也说不出不行，只好说可以可以。金明说：“那好，没有别的事你们就先去休息。”说完站起来和我们一一握手，算是送客了。我们正准备走，女兵示意我们等一下，然后她把金明送出小会议的侧门，才回过头来问我们去不去休息一下，我们说不用。女兵说：“那好，你们坐一下，我去叫司机。”其实是要我们多坐一会儿，让金明走远了，这才让我们离开。看来“让领导先走”不但早已有之，而且应该是一种规矩，即使文革也难以从根本上触动这种上尊下卑的规矩。

回到住地，我一琢磨，坏了，这一趟算是白来了。大家说：不是拿到金明的批示了吗？我说活见鬼，这张批示跟一张白纸没多大区别。大家问为什么，我说：第一，我们到哪里去找张体学？第二，就算找到了他，他认不认这张纸？第三，如果他认也同意去办，那我们直接找张体学不就行了，还找什么金明？第四，如果张体学再照这样写一张给宋侃夫（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然后宋侃夫再写一张给徐扬，这样转来转去，捆起来跟绑起来都是一回事。这些当官的，整死人不偿命，哄死人更不偿命。事已至此，我们打道回府也不为过。况且也不吃亏，按规定出差是有补助的，外省一天六角钱，住宿费照报，六角钱正好是我们在这里一天的伙食费，等于这上十天吃的是公家免费饭，而且我们也不用自责，也不算有私心，因为它名正言顺，因为它符合规定。

回到武汉，此桩公案也就不了了之。万幸，真要开除了那几个人的党籍，如今怕是又多一宗罪，又多树几个敌。

【故纸堆】

我在罗广斌死后的一些活动

刘德彬

按：本刊上期发表杨世元口述《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一文后，有读者提出希望能看到罗广斌、杨益言一方对当时有关情况的记叙。现特发表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摘自刘德彬1969年4月6日在重庆市文化系统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所写交待材料《我的交待》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按刘德彬遗孀殷光秀提供的手稿原件录入。此交代已选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及网络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第三版。

刘德彬（1922—2001），1939年加入中共，1948年因发动农民暴动被当局逮捕。1949年11月27日在国民党当局对重庆渣滓洞看守所关押的政治犯实行大屠杀时中弹负伤越狱脱险，以后与罗广斌、杨益言一起创作了《红岩》的初稿《禁铜的世界》及从中摘选出部分内容改写为回忆录发表的《在烈火中永生》。后因1958年在重庆市总工会被按“严重右倾”处分，被停止继续参加创作和在小说《红岩》出版时署名的权利。1961年撤销处分后，1962年底被调入重庆市文联任创作员（专业作家），参加罗广斌领导的《红岩》前续的创作和电影剧本《红岩》的改编。文革中追随罗广斌参加造反并卷入重庆造反派的两派冲突。1967

年2月罗广斌身亡后，刘德彬与杨益言逃到北京向中央告状。本文主要回忆了他和杨益言在北京和成都为罗广斌鸣冤翻案的一些活动。因为是交给军代表和工宣队的“交待材料”，其中一些用语难免带有时代烙印，但所述史实和反映出的当时一些心态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本文标题和文中括号里的楷体字注释是本刊加的。

67年2月5日，罗广斌在文联被抓（因罗广斌在文革中积极参加造反并介入重庆造反派的两派冲突，1967年2月5日被对立派八一五派红卫兵从重庆市文联家中绑架，10日在关押地跳楼自杀）以后，我写了一篇大字报《罗广斌是个好同志》，说他历史上没有问题，为罗说话。但罗在历史上到底有无问题，我并无十分把握，特别是在出狱问题上（罗广斌出狱问题：1949年11月27日夜，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看守所的政治犯实行大屠杀，罗广斌趁特务一度撤离之机，率白公馆难友连同两个小孩共19人一起出逃脱险。后来一些特务被捕后所写交待称罗广斌本来就未被列入屠杀名单，甚至说罗是他们放走的。此事引起有关方面重视，进行了反复调查，并未发现罗广斌等的出狱有什么问题）。因此在2月6日晚，我布置机关（指重庆市文联机关，刘德彬当时是以罗广斌为首夺权建立的文联机关文革小组成员）杨山（时为重庆市文联业务组成员）、杨甦（时为重庆市文联《奔腾》文学双周刊编辑）、张惊秋（笔名殷白，时为重庆市文联文学评论作家）、熊小凡（时为重庆市文联《奔腾》文学双周刊编辑）等一同出去调查罗到底有无问题。7日我同张惊秋去涪陵找副专员杨其昌（我常听罗广斌讲，他出狱和杨其昌一道，杨在涪陵工作），当晚由杨其昌口述，张惊秋执笔，写了罗广斌出狱经过的证明材料。这下，我心里落实了。杨其昌讲的和罗广斌谈的相同。因此，我就下决心要为罗翻案。在回重庆的船上，我又针对红卫兵对罗广斌在渣滓洞提出的问题，给垫江肖钟鼎（从国民党渣滓洞看守所脱险的中共地下党员）、长寿湖农场孙重（从国民党渣滓洞看守所脱险的中共地下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各写一信，请他们实事求是的为罗写一证明材料。

9日下午到重庆，因文联被砸抄，不敢回去，就去造反军总部（指时驻重庆市总工会大楼的工人造反军总部，在重庆市文联附近。该总部负责人黄廉与罗广斌、杨益言在反对重大八一五“右倾”中关系密切），碰见董孝富（时为重庆市文联小车司机，是罗广斌为首的文联红卫兵战斗组成员）和孙士平（时为重庆市文联业务组成员），就住在市工会大楼造反军总部里。当晚，半夜造反军总部被包围、砸抄，我从四楼上溜出来，到火车站买票到贵阳，2月10日晚便到贵阳市委韩子栋（曾被关押于国民党监狱的中共地下党员，后出逃脱险。其传奇经历启发罗广斌等创作了《红岩》中的华子良）家里，碰见了杨益言、北大女同学侯均初（历史学家侯外庐之女，因慕小说《红岩》之名与朱学文等同学到重庆串联，驻重庆市文联支持罗广斌等造反，罗广斌被绑架后，陪同杨益言逃离重庆经贵阳上京告状）、美院附中同学余刚勇（余纲勇，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生）。我们在贵

阳韩子栋家住了约四五天，进行了以下活动：

1，整理罗广斌的材料（主要是重庆两条路线斗争情况及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准备向中央文革汇报。这个材料是杨益言执笔写的。我到贵阳时他已写了一半多。

2，在贵阳认识韩的秘书王××（名字记不起来，他是市委造反派一个负责人之一）经王的串连认识了贵阳地化所（指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该所造反派当时是贵阳地区造反派的核心）一青年同学，第二天或第三天，这个同学引我们到军区招待所见了一位《解放军报》或《大公报》的记者（穿解放军服装），谈了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及被抓情况，那位记者说，他们不会把罗广斌怎样的。

3，得到罗广斌死的消息后，通过韩的秘书在市委向中央文革挂了长途电话，电话是我和侯均初去打的。

在贵阳几天，没有到旁的地方去，主要是整材料。韩子栋对罗广斌的死感到惋惜，很同情，他认为罗广斌是个好同志，他分析罗广斌在狱中没有问题。他还说，罗广斌的爱人胡蜀兴和两个小孩可以到他那里去住。我们离开贵阳时，无钱买车票，是韩叫他女婿把存款拿出来去买的。并说我们到北京后如果生活上有困难，可以去找他的老朋友周可桢。临走时，韩交一封写给周总理的信，说如果见到总理就把信交给他。信的内容不知道（到北京后，我把信邮寄中央文革转交总理）。我们离开贵阳时，韩同他的秘书怕我们在路上不安全，商量地化所的同学（他要到北京去调查）和我们同路。杨益言把他的皮大衣与韩换了一件旧棉大衣和一顶旧棉帽。

2月中旬到北京，住美院附中，3月底搬到北京地质学院，直住到国庆节，10月2日，杨益言和我离京到成都。在京期间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

1，向中央公安部接待室、中央文革接待站登记汇报了罗广斌情况，杨益言和我去汇报的。

2，向中央首长递交材料，这材料主要是以杨益言和我的名义写的一个报告，附有杨其昌的证明、原重庆市委工作组整罗广斌的材料等。江青同志那里是我到中南海侧门收发室递交的。康生同志是通过陈家俊（时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工作，与罗广斌是地下党时期的战友）由高级党校送去的。另外，中央文革还送一份，内容一样。

3，到新华社找王唯真（原为新华社驻巴西记者。1964年3月巴西发生军事政变，王唯真等九名中国人员被扣，经坚决斗争，九人被巴西军事法庭以所谓“颠覆罪”判处徒刑10年驱逐出境。1965年4月九人回国时周恩来等领导人亲到机场欢迎。“九颗红心向祖国”的报道传颂一时。后提拔为新华社副社长。文革初期因新华社其他领导都被打倒了，经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请示毛泽东同意，宣布让王唯真领导新华社业务，“有职有权”。1966年9月任新华社代社长。12月被免职。因受“王、关、戚”案的牵连被隔离审查）。到北京后大约半月左右，便去找了王唯真。一个晚上，杨回来告诉我，他去找了王，说王从巴西回国到重庆作

报告时，杨曾陪同王去渣滓洞参观。当时罗广斌生病，王曾去文联看过罗。杨说王听到罗已死感到吃惊，并说中央正在开会，叫杨快把材料送去，他可以转。过了两天，杨和我把材料送到新华社收发室，大约是3月中旬，王唯真打电话到美院附中，叫转告我们，说中央文革最近可能找你们。胡蜀兴到北京后，杨益言同胡还有北大女同学又去见了一次王唯真，他们说，王很关心胡，问有住处没有。我们等了半月左右，不见消息。因此杨益言和我到新华社找王唯真，先找到内参组长王作非，在他办公室等了一阵，王唯真来了，王谈中央的同志很忙，你们不要等了，回去等也可以，在这里等也可。王还说，你们还有什么新材料没有，特别是罗广斌是怎样死的。杨说没有。王对他旁边的王作非说，到四川重庆去的记者派了没有？王作非回答，已派了。临走时，杨益言还问王唯真，说北京有学校找他作报告，可不可以？王唯真迟疑了一下，说：你们自己决定吧！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新华社。

4，和向洛新、陈家俊（向洛新时在共青团中央工作，陈家俊是向洛新之妻，两人与罗广斌都是地下党时期战友）联系活动的情况。

我们到北京后没有一两天，就通知团中央向洛新和党校陈家俊，他们到美院附中来的。我们把罗广斌死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感到很沉痛，他们对我们在京“告状”很支持，也很积极。向康生同志送材料是通过陈家俊由高级党校送去的，陈家俊还同杨益言、胡蜀兴在清华、北大、地院等校作报告，证明罗广斌是个“好同志”，胡蜀兴到北京后曾在陈家俊家里和党校她的宿舍均住宿过。杨益言对北大女同学（指朱学文、侯均初、李景屏、韩敏中4位到重庆串联支持罗广斌等造反的女学生）提出在罗的问题上要重视串连和舆论，杨不接受，以及后来在重庆会议（指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解决重庆问题会议）上，周家喻（即周家喻，时为重庆大学学生，八一五派负责人）警告杨益言（周家喻和杨益言同为参加中央解决重庆问题会议的两派各10名正式代表之一），杨不敢回答，曾经在美院附中及向、陈家里对杨进行批评。在美院附中的会，一次向洛新来参加了，在他们家里，向、陈都参加了。他们对杨提出了批评。总之，在我们为罗翻案这个问题上，向、陈都是积极支持的。

5，和青年出版社张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小说《红岩》责任编辑）联系活动的情况交待。

头两次去出版社是杨益言去的。杨回来说，他见到张羽，和出版社的一些同志，又说出出版社的造反派，在罗广斌问题上都很支持。后来我见到了张羽并同杨去他家去吃饭。张对罗很感慨，他回忆了罗在创作时的一些情况，说罗是很好的一个同志。以后他曾为我们去团校（只住了几天）和出版社机关安排住宿。以张为首，出版社还组织了几个人专门写文章，出《红岩战报》，该报共出了两期，杨益言也参加了工作，如稿子的安排等。张羽还参加了作报告的活动。以后出版社感到张的历史上有问题，才停止张的活动，改为黄伊同我们联系。

6，在北京作报告的活动。

三月底，我们搬到地质学院，当时北京去重庆串连的同学纷纷回到北京。重

庆也有一大批工人、学生、干部逃到北京，大多住地质学院。北京三司的同学专门组织力量，在各大院校介绍重庆二、三月镇反情况，在他们作报告的同时，也安排了杨益言、胡蜀兴同时介绍罗广斌的情况，先后在地院、清华、北大、工大、部分工厂、机关，大约有二十余次（未作统计）作过报告。有几次张羽、陈家俊，还有重庆造反军的头头黄廉（时为重庆市木材公司鱼鳅浩木材加工厂采购员，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都去作过。这些报告，只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七机部 9·16，我去参加了，但报告我一次未作。有好几次杨益言要我去，我拒绝了。主要是我对造舆论有不同看法（刘德彬认为罗广斌问题应由党组织调查解决，不应在群众中造舆论），但我未公开抵制，我怕他们说我不右倾。

7，协助北地罗广斌调查组的活动。

四月初，杨益言在地院作报告后的不几天，地院东方红负责人之一的孟繁华在地院十二楼（我们住在十二楼）碰见我说，他找了三个同学，东方红的战士，专门对罗广斌的问题进行调查，我当时很高兴。他把三个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个叫曾昭贵，另两个名字记不起。一个月以后，这两个就未参加调查了。此外，北大的四个女同学，清华的周学勤，美院附中的余刚勇，都参加了调查组。我同杨益言为调查组提供线索，他们的调查报告参加过讨论，杨和我还协助调查组收调查材料，按历史顺序编印了一本罗广斌历史资料。……

8，在四川会议、重庆会议（指 1967 年 4—5 月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和重庆问题的会议）前后活动情况。

我们到北京后不久，碰见了西师 8·31 负责人岳朝亮（时为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主要负责人，中共党员），重庆职工造反团负责人罗光远（时为重庆市税务局两路口税务所干部，转业军人，重庆职工造反团主要负责人），他们二人因与罗广斌有联系，曾被打成反革命，所以他们在为罗广斌翻案这问题上很积极。在总理第一次接见四川代表时，岳朝亮去了，他汇报了罗广斌问题。不几天岳回重庆去了。在四川会议期间北京同学赴渝战斗兵团（指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决定重庆推荐 10 名代表（指重庆反革联会一派，即后来的反到底派推荐 10 名代表。当时重庆革联会一派即八一五派也有对等的 10 名代表），由于地院在罗广斌问题上支持，10 名代表中有一名干部就决定了杨益言参加。罗光远系工人代表之一。这时，北大几个女同学，地院调查组，还有罗光远和我们几次研究，把罗广斌问题作为重庆的一个关键问题提出来向中央汇报，当时遭到重庆学生代表徐光明（时为重庆大学无线电系学生，反对重大八一五的重庆大学红岩公社负责人）的反对。北京三司的同学也不赞成。杨益言的意见，说不能单独提出罗广斌问题，应从重庆的两条路线斗争来汇报罗广斌的情况。这事，北大女同学及胡蜀兴是反对的。因此对杨益言很有意见。

四川会议之后，接着重庆会议。原出席四川会议的 10 名重庆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代表住在西苑旅社。杨益言和黄廉住在一起。会议期间，杨、黄一起还在外面去作了几次报告。在会上提不提出罗广斌问题，代表内部也有争论。据杨讲，讨论几次都无结果。黄廉同意在总的汇报中把罗广斌作为一个事例提出来。最后

一次会议，因学生造反，杨益言未出席会议。

正是在开四川会议期间，胡蜀兴、杨益言、我，还有罗光远等写信送交江青同志，请求接见，专门汇报罗广斌问题。不几天，江青同志批示戚本禹，戚派了两个同志到地院来找我们，由杨益言、胡蜀兴汇报了罗广斌的有关情况，参加这次谈话的有北大、清华、地院、重庆西师的同学十余人。

9，在北京接触重庆肖、李、廖（萧、李、廖：指中共重庆市委前组织部长萧泽宽、前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前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廖伯康，他们因于1962年向中央反映四川省委领导人李井泉强迫命令瞎指挥，造成四川粮食大减产，老百姓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而于1963年遭到打击报复，按“反党集团”性质批判处理，文革初期又被抛出作为“黑帮”批判）的情况。

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还有高兰戈（前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在“萧、李、廖”一案中受牵连遭到批判处分）住地院北翼楼，我住十二楼，我和他们曾有多次接触。开初，我对他们思想上有戒备，认为他们是有名的黑帮。他们主动向我介绍他们如何被李井泉整及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如何发现他们并把他们弄到北京等情况后，我思想上还是有疑虑。后来，我问地院赴渝联络站负责人李云生关于他们的情况后，我相信了他们是“革命干部”，是李井泉“打击迫害”的。因此，我曾多次到他们那里去过。我在思想上是支持他们，同情他们的。我也曾多次鼓励他们写揭发李井泉和任白戈的材料，揭黑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据我知道他们在地院有以下一些活动：1，向总理递送了一个申诉报告。2，他们铅印了一份如何受李井泉打击迫害的材料。3，写李井泉、任白戈及辛易之的材料。4，地院调查组规定他们写的材料。5，在罗广斌问题上他们是同情支持的，为地院罗广斌调查组专门分别写了证明材料。5，张黎群（前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前被贬为绵阳地委文教书记。因曾于1962年主持《重庆日报·巴山漫话》和《成都晚报·夜谈》专栏，在文革初期被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定为“黑帮”，公开点名批判）曾经被北京同学西南联络站弄到北京，张与肖、李、廖在地院见过面，谈些什么内容不清楚。6，重庆到北京的干部如王墨林（时为中共重庆市市中区委书记）、王公杰（时为重庆市江北区区长）、宋学武（时为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隆华（时为重庆市轻工业局局长）、重庆日报的王古泽（前《重庆日报》副刊组组长，文革初期被打成《重庆日报》“三家村”成员，遭到点名批判）等都到肖、李、廖那里去过。7，造反军负责人黄廉曾到肖、李、廖那里，向他们了解过情况。

10，在北京接文联机关（指重庆市文联机关）来京情况。

文联机关先后来京和我接触的有张惊秋、杨甦、熊小凡、孙士平、刘序椒（女，重庆市文联会计）、董孝富夫妇、李南力（时为重庆市文联专业作家，原由西南军区创作室转业。1957年被打成“右派”，已“摘帽”）、温田丰（时为重庆市文联业务组成员，原为记者，于抗战初期在延安由毛泽东批示、罗瑞卿介绍加入中共。1957年被打成“右派”，已“摘帽”）等。

四川会议期间，董孝富夫妇来京，住地院。他们夫妇谈了他们被抓、被打、

关监的情况，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份告状的材料，另为地院调查组写了一份参观罗广斌尸体的证明材料。重庆会议后他们离京回渝。

张惊秋大约是八月份同美协正威（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专业画家，小说《红岩》插图主要作者之一。文革初期遭到工作组批判，曾被隔离审查，后起来造反）一同来京的，与他们一同来的还有复旦大学在渝串连的一个女同学，张在地院住十二楼，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份文联机关因罗广斌（避开罗的历史问题）而遭打击一大片的材料。我曾听他说过，他和穆欣很熟，想找他，但在他的一些老朋友言谈中，穆不易见，因此未去。他经常出去找他晋西工作时的一些同志，哪些人，他未谈。有一次他带了一个名叫叶石的人到地院来，只跟我们介绍了姓名，后来我到成都才听说叶石是个右派。他还谈到他在重庆给罗光远职工造反团总部作过秘书的事。

熊小凡、杨甦、孙士平一道来京的。在地院住了两三天孙士平就回川了。熊住他妹夫家里，杨也住他妹夫家里。在来地院时，熊、杨主动向我谈，他们在罗的问题上，曾经在去武汉的途中船上作了自我检讨，他们已经写好一个文联机关同志在二、三月镇反时的一个报告，交中央文革。我曾到他们两个妹妹家吃过饭。国庆节前他们回成都，临走时，地院调查组曾委托他们到西南局找雷雨田调查雷解放初期审查罗广斌的情况。

李南力到地院来（和陈孟汀〔原中共重庆市委文教部长，1957年被打成“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一道）住了两天，因地院不能住，他就住在外边。他向我谈了他们也因罗的关系在长寿湖被关了几十天，后逃出来的。他带来了一份谭显殷（原川东地下党干部，重庆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1957年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任上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党籍）向中央文革反映的一份材料。我没有和李多谈，只一般表示同情而已。

温田丰多久到京不清楚。只一天在地院十二楼门前碰见他谈了几句，他得意洋洋地拿出中央文革接待站给他写的证明，他还向李南力说，右派可以翻案（大意），并讲他准备到上海、杭州去逛一圈才回去。我当时冷笑了一下。对他的翻案我一直是反对的。66年10月，我在机关文革小组，他就拿了一份翻案材料给我，我不同意，并对他提过警告。

刘序椒，是与杨益言的爱人何明扬一同到京的。她住全国妇联。她到地院来过，我也曾到妇联去看过她。据我知道，她去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过罗广斌的问题，另外，她在山东曾经被挨打击的情况，向中央文革告过状。当时因她快要生小孩，我们劝她早点回渝，她没住多久就回重庆了。

67年国庆节，我们不能在地院住了，同时地院罗广斌调查组准备结束，把我们这一案送四川省革筹处理。因此，10月2日杨益言和我由京乘车到成都，我们到成都后，碰见调查组负责人曾昭贵，他已把罗广斌有关调查材料送给了省革筹，并请示了张政委（即张国华，时为成都军区政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张政委指示地院调查组及重庆造反派继续进行调查。杨益言和我被安排在地质局地院驻蓉联络站住宿。大约住了一个多月，就搬到川大第二招待所。

我们在成都进行了以下活动：

1，地院调查组根据张政委指示，他们把调查工作交给了重庆西师 8·31 的同学继续调查。西师的同学着重调查了李井泉搞罗广斌的问题及罗广斌的出狱问题等。这段期间，我和杨益言翻印了罗广斌的历史调查材料，并根据地院的调查报告，重新写了个罗广斌历史调查报告。

2，为成都军工井冈山编辑部写为罗广斌翻案的文章。

我们到成都后不久，军工井冈山编辑部负责人黄世学即来了解罗广斌的情况。我们向他介绍了，他又向调查组索阅了罗广斌的全部调查材料。据黄世学讲，他还请示了省革筹政工组宣传组有关负责人。文章是黄世学、杨益言、我和省文联的陈朝宏（军工井冈山编辑部请来的）共同研究决定，把罗广斌作为山城一个突出事件来写，因此决定写四评山城罗广斌事件。意图揭露李、任死党的罪恶。一评（题为《揭开李廖死党利用派性制造罗广斌事件的黑幕》）是陈写的，二评（题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卫士》）、四评（题为《关于小说〈红岩〉》）是杨执笔写的，三评（题为《关于罗广斌同志的历史》）是我写的。稿子写好后，军工井冈山编辑部曾将稿子送省政工组宣传组审查，在决定出之前，编辑部负责人黄世学曾带杨益言、我，还有西师一同学去政工组宣传组向负责人汇报。在送稿付印之前，我向机关记得是郭清（重庆市文联炊事员，原为罗广斌主持的文联文革小组名义上的组长）和熊小凡带信，请机关派两个同志来成都看看稿子，后来张惊秋来了，说其他同志不空。张和我一道在川大第二招待所对稿子个别用词不当的作了修改。报纸是在 3·15 前夕印出来的。还未正式发行，中央 3·15 指示（1968 年 3 月 15 日，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 and 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对四川局势发表重要讲话。时称“三一五指示”。江青在讲话中说：“因为一个剧叫我调查，华蓥山我做了调查，碰见鬼，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从此无人再敢为罗广斌翻案）下达，黄世学和我一同研究，决定坚决执行 3·15 指示，报纸一律不发行（实际上该报已经流入社会），作废纸处理。编辑部向政工组作了汇报，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

3，在成都串连的情况。

我们在成都期间没有公开活动过，主要原因是怕 8·15 来成都搞我们。我曾到川大找过尹正良同学，送了一本罗广斌历史调查资料给他；曾到省文联找 8·26 之声编辑部负责人联系和军工井冈山编辑部共同名义出罗广斌的材料；机关东方红纵队（重庆市文联机关拥护罗广斌的一派在 1967 年夏成立的组织，属反到底派）郭清、熊小凡、岳克（即杨大矛，时为重庆市文联编辑）来川大和杨益言、我见过一次，主要谈对罗广斌的一些看法，和机关的一些情况，我提出请他们了解和审查我自己的问题；在会上他们提出希望我们回去，我说现在安全无保障。另外，还同郭清、老董、熊小凡接触过一次，向他们反映杨益言的问题，并请求他们对我进行调查了解。杨益言到打李总站（即由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和成都

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派建立的“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联络总站”)找一负责人谈过一次罗广斌的情况，是杨谈了以后回来告诉我的。

在川大，我还接触过以下一些人，这些多半是有问题的：

赵唯（原川东地下党干部，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1950年代曾任中共四川省万县地委委员、统战部长，万县专署副专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并撤销党内外职务。文革中起来造反，要求平反，1967年“二、三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狱）（摘帽右派，解放前我曾在云阳赵的家乡作过地下工作），郑业瑞（原被国民党关押于重庆白公馆看守所的政治犯，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与罗广斌一起逃出脱险。1950年代曾任万县农业试验场场长兼农业学校校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60年“摘帽”后任梁平县仁贤农技站技术员。文革中起来造反，要求平反。曾在1967年5月30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41期上发表《白公馆中的罗广斌同志》，为罗广斌辩护。1970年4月“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以“右派翻案”等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杀害），他们是万县主力军（即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万县地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的，同主力军负责人一同来蓉向省革筹反映情况。他们向我要罗广斌的资料，我给了两本罗广斌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给他们。我还向郑业瑞讯问罗广斌出狱的具体情节。

卢光特（原川东地下党干部。1950年代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处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长寿湖农场劳改。文革中起来造反，要求平反，参加了成都八二六派组织的川东地下党联合调查组工作）、张文澄（原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全重庆宣传、文教系统大批中共干部被打成“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均系摘帽右派），卢住第二招待所，张住学生宿舍。卢说他是川大8·26弄他上来调查了解四川地下党情况的（川大8·26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他曾几次向我表示他们是支持罗广斌的，要我对他们表态。我没有表态，他很有意见。他们找了好些右派在川大开会，斗（川语“凑”之意）材料，我觉得有问题，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

林向北、廖宁君夫妇（林向北，原川东地下党干部，1954年参加狮子滩水电站建设，任工程局供应处长、办公室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廖宁君，林向北之妻，原狮子滩水电站俱乐部主任。廖母即著名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他们为陈联诗（女，原川东地下党员、四川华蓥山地区著名游击队负责人，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1952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劝退”失去中共党籍。1960年在抑郁中逝世）翻案，和我有几次接触。他们成立华蓥山纵队，约我去参加，我拒绝了。

陈伯纯（原川东地下党干部，1948年华蓥山农民暴动时任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成都市物资局办公室主任），曾到他家去过两次，一般的玩玩，我向他们介绍过罗广斌的情况，送过资料。他们对罗是同情支持的。

易难（省团委），我也曾到他家去过几次，介绍过罗广斌的情况，他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关，我同情他，他对罗广斌也同情。

钱洪荃（原在重庆与我一起工作过，现在省人委办公厅），我曾到她家去过几次，她帮我转过信，如家里寄粮票，我弟弟由北京给我寄钱、寄衣服等。她是廖伯康的弟媳。对肖、李、廖和罗广斌都是同情支持的。

罗佑华（罗广斌的堂侄女，成都某中学教师），我曾在她家住过。她对罗广斌是同情支持的。

在成都川大又接触了李止舟、廖伯康和高兰戈。68年2月，北京地质学院曾昭贵持该校革委会介绍信，将李、廖送回成都，交省革筹。据曾昭贵讲，经张政委指示，由天宝（藏族，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同志处理他们。天宝同意李、廖暂住川大待处。曾昭贵和西师的同学到重庆对肖、李、廖的历史问题进一步调查。据曾讲，李、廖的历史是有问题的，但一时无法调查清楚。因此，把肖、李、廖这一案交给了省革筹。在川大第二招待所有好几次接触，大多曾昭贵和西师的同学都在场。个别接触时也是一般的谈谈。我对他们的态度是随着地院调查组的态度改变而改变。5月下旬，李、廖和杨益言被川大8·26把他们抓了（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实际上是支持为罗广斌和“萧、李、廖”翻案的，但中央领导人“三一五指示”下达后，他们不得不表示拥护，并将住在川大的杨益言和李、廖等人抓起来送交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处理）。我是后来知道的。

高兰戈没有住川大，比较多的时间住陈伯纯家里和西南局。他经常谈他是受冤枉和牵连，他是反对李井泉和任白戈的。他说，他曾经去找过黄廉，黄告诉他，你的问题以后解决，不要被8·15抓住就行了。因他儿子的关系（他儿子是军工的一个头头）（高兰戈之子李鲁沂，时为国营重庆嘉陵机器厂工人，退伍军人，1967年夏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负责人，8月初率武斗人员及轮船“嘉陵1号”加入军工井冈山“舰队”，任“舰队”副司令。运送增援物资到杨家坪国营重庆建设机床厂后，8月中旬在武斗中身亡）。他还找过嘉陵厂军工的负责人，高的爱人李砚琪在北京、成都我都见过。从她言谈中对肖、李、廖、高翻案是很积极的。

.....

在68年3·15指示下达后，我在罗广斌问题上就停止了一切活动。当时我思想上对某些问题，如罗广斌到底是什么人，还不够理解，但无论如何对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是要听从的，不能有任何怀疑。江青同志的指示，使我得到猛醒，得到挽救，促使我对罗广斌的看法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回头来检查自己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所犯的一切罪行。

我在68年5月底离开川大，至今我的工作证还押在川大第二招待所（因去川大时登记住宿是我拿工作证去登记的）。杨益言在川大第二招待所被抓，我一直不敢去取。6月份我又回地质局和我堂弟刘代学（测绘队的，他在地质局养病）住在一起，这时我痔疮复发，直肠脱出很厉害，行动困难，因此7月份就到西城区痔漏医院住院开刀，住院时怕因罗广斌问题医院不收留，就改名刘德明住院。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出院后在罗佑华及西师同学侯光清家里（广汉乡下）住了一

段时间。这时，成都地区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已开展，住宿困难，我思想上很苦闷，进退艰难，回重庆怕被抓，挨整，不回去又无住处。11月初我决定回重庆看看情况，能回机关就回，不行就到我家乡去一趟。离开成都之前我曾到胡蜀兴（另有专门材料交待揭发）那里，她住在罗广斌家里。她知道我要走，无论如何要和我一道。她说跟他妈妈住在一起怕以后不好交待。她很激动，还说就求你这一次。我想，她的问题比我轻，没有地下党、走资派这类问题，只是在罗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怕她自杀，一面安慰她，一面说我先到重庆看看，找找地方，你跟着就来。大约11月7号左右我到重庆，家不敢回，其他熟同志的住地又不敢去，一怕自己牵连人家，二怕人家不接纳，于是就想到两个地方，一是冉家巷7号罗光远家里，二是东华观37号黄乾伯家里（黄和我在成都认识一面，他自我介绍他是我爱人的老师），他们都曾对我表示过，回重庆有困难可到他那里去住。我住在罗光远家里，过了两三天，胡蜀兴来了，我到车站去接的。把胡安排在黄家住。当时我感觉重庆也很紧，听说又在抓人。我找黄到文联机关去见我爱人，说我想回来接受审查，先到警司和市革委去报到，看我爱人有啥意见。黄回来说，我爱人同意我回去。过了两天听黄讲，815在抓反到底的一些头头，有些都跑了。这时我思想上很紧张，罗光远也觉得我们是个包袱。于是和胡商量，动员她回成都，我回垫江，14日晚我把她送上车，15日我就赶船到长寿回垫江。

到垫江先在太平公社五一大队我嬢嬢（贫农）家里住了约一个月。后来就到高峰公社大山大队我姑妈（贫农）家里住了三个多月。因垫江两派对立很厉害，仍在武斗，我住的地区都是垫江勤务站一派的控制的，听说勤务站又是815观点的，因此我住在我嬢嬢和姑妈家里没有出去过，在家里帮助家务劳动，有时去赶场买点东西。在乡下对重庆情况不了解，对重庆的变化更不知道。旧历年半个月左右，我曾给李功勋（原与我在工会一同工作的，现在长寿湖农场）写过一信，寄他家里，请他告诉我重庆近况。并请他问问我爱人何时回来。但我一直未得回信。春节后我就要回来，几个表弟无论如何不让我走，又住了一月，直到3月27日我才回到机关，由于工宣队、解放军、机关斗批改组的关怀，第二天来到了学习班。

【编读往来】

1、陈仁德来信谈杨世元口述

《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一文全部看完，如同重新经历了一次文革闹剧。前后用了九年时间来记录这段极有价值的历史，精神可嘉，令我感动。杨世元先生的口述比较客观真实，不避讳，不歪曲，有史家之风。罗广斌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对罗的评价至今仍很难说公正。但杨世元先生的叙述是使人信服的。关于罗广斌的狱中脱险，我也掌握一些情况，足以证明绝非“越狱”，而是“放生”。有多种因素促成了徐远举的放生，文中提到的只是因素之一，但是所有因素的共同

点都指向罗广文，如果没有罗广文的关系，罗广斌是不可能越狱的。文中只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在谈到文革罗家的遭遇时说：“罗广斌哥哥罗广文在山东遭到了冲击”，事实上罗广文先生在 1956 年已经去世，文革时他本人不可能遭到冲击。

2、唐潇来信谈杨杨元口述

杨世元是我心悦诚服拜师的长者。他的重庆文联口述史的内容，也是我们 N 次谈话中的内容之一，很多在现已发表的文中没有披露的尖锐细节，在我的录音里都有。但我认真看了这次发表的校阅稿，依然感到深深的震撼。

杨老师是个心直口快的读书人。这个学识渊博如百科全书的长者，49 年后，最初的理想本是当一个作家，却被折腾得作家梦破灭。他儿子就对我说过，老爷子本身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其实，重庆文联口述史里面的故事，他早在重庆，就逢人（这种人，是有历史感的人）便说，甚至在 CCTV 百家讲坛的“红岩档案解密”的采访中，也大说特说。他后来对我感慨：我说的，电视起码删了三分之二！

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十年浩劫这么简单的口述史，很多情节都显示和 49 年后的文艺政策有关。联想到前不久还大张旗鼓地纪念延安文艺讲话的闹剧，我一样觉得，这个口述史依然对未来文艺生活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杨老师写东西，非常注重实证和证据。我在帮忙打印和校对他的另外两篇文章时，就强烈感受到这点。他说过，他的结论和道理，心存芥蒂的人，是无法反驳的，他们专门在一些细节上反复纠缠你，细节若不准确，他们就有推翻你的观点的理由了。他的这个习惯，在这部 9 年前开始写的口述史里，一样有完好坚守。说个细节：为了校对这部口述史，他为了找书查资料，登上高高的书柜，一不小心还把腰给扭伤了。

“意义只有在完整的故事里，换句话说，完整的故事才有意义。”一个哲学家的这句话使我想到，对于口述历史，应把时间段尽量往前后延伸一些，这样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才可能更加清晰。

我曾问过杨老师，有些事情明明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为什么大家要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偏要等以后搞历史的去“钩”什么“沉”？他说不是所有人都看重历史真相，一些当事人和决策者主要考虑的还是利益。这让我感到纠结。